

兒童的抗戰經驗與記憶：以知識階層日常生活為中心的探討*

柯 佳 昕**

摘 要

本文以兒童的主體性作為研究抗戰史的視角，探討知識階層兒童的戰爭經驗與記憶，旨在突顯主流抗戰史長期

* 本文部份改寫自筆者的博士論文〈抗戰時期中國家庭的情感及日常生活(1937-1945)〉，修改過程獲得中研院近史所「近代中國婦女史碩博士論文獎」的獎助支持。初稿曾宣讀於「歷史記憶的多元探索」工作坊(2020年7月16-17日，中研院近史所)，感謝會議評論人張瑞德教授，以及與會的游鑑明教授、連玲玲教授提供回饋與建議。筆者亦十分感謝本刊匿名審查專家用心提出寶貴意見，並耐心反覆審閱。寫作期間，承蒙張妍妍博士、葉韋君博士、張玉潤及林東璟學友的提點與協助，特致謝忱。

收稿日期：2021年3月9日，通過刊登日期：2021年8月4日。

** 中山大學歷史學系(珠海)副研究員

以來忽略的兒童聲音，及其背後所呈現的國族歷史意識。一方面，利用自傳與口述訪談資料，分析傳主所陳述的童年經歷；另一方面，關注傳主如何以兒童視角的獨特性，詮釋戰爭經歷在其生命史中的意義，呈現人們看待歷史的複雜性。通過分析兒童私領域的家庭生活、公領域的學校活動，以及兒童創造的兒童遊戲文化，說明抗戰兒童的重要經歷與歷史意義。兒童通常經由家庭或學校參與戰爭，在走向集體的過程中深化民族意識；他們積極面對戰爭，從事各種勞務活動，與成人共同承擔戰爭壓力；以「游學」或轉進「私塾」的方式，克服因戰爭被中斷的學業；在成人的安排之外，發揮創意，利用戰爭遊戲將歷史經驗保存下來。兒童作為行動主體，以他們自己的方式參與戰爭，當其個人生命史連結家族史、國族歷史的同時，不但重新審視了抗戰對普通人的歷史意義，也在人類反思戰爭的努力上做出貢獻。

關鍵詞：兒童史、兒童文化、抗日戰爭、記憶、日常生活

前言：尋找中國兒童的抗戰身影

抗日戰爭，是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最重要的一場戰爭，其勝敗攸關全中華民族生死存亡。近年來，學界研究焦點已逐漸從主流政治、經濟、外交、軍事史，轉向開拓社會文化、日常生活、記憶等多元領域，並且從各種社會階層的視角探索這場戰爭的重要性。¹ 在這場巨變中，幾乎所有的社會群體都受到史家不同程度的關注，但是兒童與抗戰的關係卻鮮少被論及。以抗戰時期的中國家庭為例，戰爭加速家庭觀念與結構變化，四處逃難的生活型態使得傳統大家庭不再易於維持，小家庭成為主流。² 同時，夫妻角色發生變化，婚姻關係變得極不穩定。³ 反觀，戰時兒童不但是重要的家庭成員，也是國家的一份子，他們成長於戰爭，在戰後成為復興民族的中堅力量。然而他們在抗戰中的經驗與角色，以及抗戰這段歷史記憶對他們人生具有何種價值，甚至對整個民族抗戰史的意義，並未得到相應的探討。

兒童聲音的缺席，在於掌握書寫權力的成人對其一貫採

-
- 1 2015年呂芳上主編的《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叢書，強調集結國內外近現代專家，在新史料、新研究的基礎處上，提出新議題，開拓新領域，建構新觀點。討論議題遍及「政治、軍事、外交」及「社會、文化、區域研究」，以及「和與戰」、「人與社會」，並且採取新史料、新的視角來探索戰爭史研究。參考呂芳上主編，《戰爭的歷史與記憶》（臺北：國史館，2015）。
 - 2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著，廖彥博譯，《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臺北：時報文化，2015），頁26、332-333。
 - 3 呂芳上，〈另一種「偽組織」：抗戰時期婚姻與家庭問題初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3（1995年8月），頁97-121；柯惠鈴，〈戰時的婚姻與家庭〉，收入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爭史新編》（臺北：國史館，2015），頁109-141。

取消極思維。⁴ 兒童一向被視作尚未取得資格進入社會運作的未成年人。過去人們定義兒童的價值，主要是想像兒童的未來，而不是依據兒童的現狀。⁵ 換句話說，童年或兒童身份，僅被視為個人生命階段的一個過渡期，或是一段社會化的過程。最要緊的是通過童年，完成未來更重要的目標：進化成為思想與行為成熟的大人。本文的首要目的就在於將兒童放置回抗戰巨變下的日常生活。從兒童視角出發，理解他們如何認識抗戰，並觀察戰爭以何種方式進入他們的生活，帶來哪些變化與影響，以及他們如何詮釋戰爭在其生命中的意義。

不同於研究「兒童觀」或「兒童概念」的觀念史變化，本文旨在突顯以兒童自身經驗為主體的戰時生活，利用自傳作者與口述訪問受訪者所敘述的童年經歷呈現兒童的主體性。回顧近代「兒童觀」的出現，始終離不開公領域意識形態的論述。晚清以來，現代意義上的「發現兒童」是知識份子用以改造中國的思想利器。隨後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知識份子高舉「兒童本位」觀念，刻意將兒童獨立於成人，藉此象徵個人的覺醒，利用兒童作為重構家庭倫理秩序的要角。但同時，兒童也被知識份子賦予新身份，宣稱他們是「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化作國族邁向現代化的新符碼。上述兩種觀念，一是與個人主義桴鼓相應的兒童本位觀，另一是與國族主義緊密扣合的現代性兒童觀，這兩種聲音主導二十世

4 熊秉真在其研究中提及歷史是一門「勢力」學問，有權勢的書寫者掌握了知識的內容與定義。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頁13。

5 威廉·A·科薩羅(William A. Corsaro)著，張藍予譯，《童年社會學（第四版）》（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6），頁5。

紀上半葉公領域兒童論述的走向。

然而，進入抗戰階段後，在強大的抗日救亡論述席捲下，各種社會思潮逐漸淹沒在國族聲浪中。講求人格獨立的「兒童本位」觀，在救亡關鍵時刻讓位給國族主義話語主導下的兒童觀。⁶ 因此，一方面在國家及政黨動員下，兒童順理成章作為接受救國號召的正向力量；但另一方面，兒童在成人視角下扮演需要被拯救與受保護的對象。綜觀目前學界論及抗戰兒童的角色，即依循上述兩種思路：集中探討「兒童保育會」組織對難童的救助，⁷ 以及宣揚兒童參加抗日團體的愛國活動，⁸ 鮮少有從兒童角度出發，探討兒童與戰爭的關係。

要之，在公領域的論述中，提出兒童觀念的人從來都不是兒童自身。兒童無論是被擺放在個人主義或國族主義框架之下，均出自知識份子塑造新文化或鼓吹新思想的意志。為什麼真正的兒童聲音難以被聽見？首先，兒童因為年齡幼小的關係，仰賴成人的照顧，屬於社會權力結構中的弱勢群體，他們的聲音容易受忽略。其次，兒童的生命正處在發展中的階段，具有不穩定的流動特質，使得真正的兒童主體經驗難以被捕捉。再者，展示在公領域的兒童聲音，通常是在成人

6 徐蘭君指出正是戰時救國論述模糊了成人與兒童的界線，使兒童過早負擔起國家公民的義務與責任。徐蘭君，《兒童與戰爭：國族、教育及大眾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9。

7 林佳樺，〈戰時兒童保育會之兒童教養〉，《兩岸發展史研究》，期1（2006年8月），頁301-345；張純，《抗日戰爭時期戰時兒童保育會研究》（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

8 羅存康，《少年兒童與抗日戰爭》（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該書介紹各地兒童抗戰救亡團體活動，並認為「大人救國，小孩也要救國」是當時廣大少年兒童的心聲。

引導下，有意為之的結果，並不能完全表現兒童的真實面貌。例如戰爭時期刊載於報章的兒童創作，主題往往圍繞著愛國，兒童的聲音被媒體置放在國族主義宏大敘事框架下，旨在鼓舞人心，間接提醒成人毋忘救國責任。雖然兒童表現出愛國精神未必就會喪失其主體性，但正是因為愛國思想理所當然被視為是當時人的普遍思維，因此檢視抗戰救國這件事是如何被兒童理解與接受，並且在日常生活中進行實踐就有其必要性。據此，本文以兒童為主體的戰爭經驗，從兒童的視角觀察國族主義的形成與建構過程，而不是以符合國族立場為研究目的。更重要的是，藉由分析兒童的戰爭經驗，闡述兒童究竟過著什麼樣的戰爭生活，以及他們對戰爭的感受與認知。

本文所主張兒童主體的發聲，乃是依據親歷戰爭者透過回憶而記述下來的兒童經驗。雖然這些「後來的聲音」已經與事發當下的回應產生距離，但正是這些為數不多的紀錄，使得受忽略的群體經驗得到「重現」的機會。無可否認，這裡所謂兒童主體的聲音，更多是在兒童成長過程中接受環境薰陶，以及與現實不斷互動的結果。換言之，回憶性的資料固然存在「現在的我」如何看待過去，甚至與當下社會各種意識形態交纏，卻也保留了「過去的我」的心態，兩者互相交流。而現在的我主動與過去的我進行對話，表明敘述者願意對個人曾經參與的歷史事件積極做出詮釋。底下將進一步說明，這些親歷者記述個人經驗作為歷史材料的重要性與獨特性，以及本文採取的解讀視角。

一、尋求公諸於世的抗戰記憶

記憶是歷史的前身。透過某些運作機制被選擇而留下的記憶，成為活著的人認知「歷史」的一部分。這些被權威性機構揀擇後的歷史，通常必須攸關宏大敘述，扣緊現實認同。但是同樣出於選擇下的個人歷史記憶，卻經常遭到史家質疑與歷史事實不符。過去在實證史學追求客觀的標準下，個人的經驗往往與主觀認知被劃上等號。可是史家掌握再多的歷史事實，永遠無法百分之百還原真實的歷史圖像。⁹ 關鍵在於以人為主體的歷史學，尋求客觀的過程中無法擺脫與生俱來的主觀意識。那麼這種追溯個人過往經驗而取得的記憶，對歷史研究能帶來何種啓發與意義？¹⁰

1920 年代法國社會學家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指出個人記憶深受社會因素的制約，強調如果沒有個人所處社會作為參照框架，個人記憶的形成與保存就

9 何兆武認為一堆史實作為元件，並不自然形成對歷史的理解，對歷史的理解才形成歷史圖像。史實是客觀存在，但根據史實構造出來的歷史圖像，存在於史家心中。史家根據同樣史實，可以構成不同歷史圖像，謙遜的史家承認自己的構圖最多是近似值。參見何兆武，《可能與現實：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頁 3-15。

10 近年學界從「個人」視角出發，對主流宏大敘述提出挑戰與反思的研究不少。例如：游鑑明，〈處處無家處處家：中國知識女性的烽火歲月〉，《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3（2014 年 6 月），頁 1-63；張瑞德，〈在轟炸的陰影下——抗戰時期重慶民眾對空襲的心理反應〉，收入林麗月主編，《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臺北：唐山出版社，2006），頁 261-278；連玲玲，〈從自我書寫到公眾展演：艾佩琪(Peggy Abkhazi) 的戰時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集刊》，期 86（2014 年 12 月），頁 49-93；王超然，〈超越國族：由口述史中的個人體驗反思抗戰〉，《東吳歷史學報》，期 36（2016 年 12 月），頁 39-69。

不可能存在。¹¹ 我們也許不必像哈布瓦赫走得那麼遠，卻同意身處社會的個人其記憶必定有些來自社會記憶；同時，個人記憶的某些部分又能轉化為社會記憶。¹² 這有助於我們理解自傳與口述歷史這些原屬於個人性質記憶的資料，經過有意或無意的選擇、重組，以及出版等等各種複雜機制運作下，成為集體記憶的一部分。本文所利用的材料，來自已出版的自傳與口述歷史，這些原先屬於個人記憶的材料，因為公開出版的緣故，以廣大讀者作為受眾，而得以進入社會記憶。

這些來自個人記憶的故事，為何會進入公眾視野？回答此問題之前，有必要先瞭解本文使用的材料具有哪些特殊性與價值。首先，本文的研究對象「抗戰兒童」，指的是 1937-1945 年抗戰期間正值童年階段的兒童。¹³ 本文分析的自傳作者與口述訪談受訪者，一共 9 位，底下統稱為傳主，分別

11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參見揚·阿斯曼(Jan Assmann)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28。

12 參見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卷34期3(1996年9月)，頁147-184。

13 民國時期對兒童的年齡的界定，可以參酌 1935 年 1 月 1 日公布、7 月 1 日實施的《中華民國刑法》，第四章第三十條規定未滿 13 歲者行為不罰，13 歲以上未滿 16 歲則減輕本刑二分之一。其次，根據民國時期對兒童所進行的社會調查資料，多以 17 歲為界，零星個案超過 20 歲。參見李文海主編，夏明方、黃興濤副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底邊社會卷(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頁 1-181。第三，目前學界對民國時期兒童年齡討論，張純在《抗日戰爭時期戰時兒童保育會研究》指出戰時保育會主要收容 15 歲以下兒童；而羅存康在《少年兒童與抗日戰爭》研究對象主要是 14 歲以下，不超過 16 歲。第四，比較目前國際《兒童權利公約》，界定兒童年齡是指 18 歲以下。

是：王鼎鈞(1925-)、崔玖(1926-2018)、楊以琳(1928-?)、成湯(1928-?)、潘際鑾(1927-)、豐一吟(1929-)、金敬邁(1930-?)、陳彥增(1934-)，以及瓊瑤(1938-)。此外，本文還參考少部分中學生的案例，但主要取材於 12 歲以下的兒童或小學生的生命經驗。

其次，一項重要特徵是這些傳主的父母十分重視教育。這些父母的身份多半是受過教育的知識階層，致使傳主們比起一般同輩的兒童，更容易獲得教育資源。尤其是傳主父母們看重教育的態度，主張受教育的程度越高，日後越能在社會上得到更好的發展機會並且改變命運。傳主們正是從父母身上學習到這種思維，激勵他們面臨教育資源匱乏的情況下，仍願意主動學習，積極爭取各種受教育的機會，並由此奠基出色的文字表達能力。¹⁴ 這也與後來他們主動撰寫自傳

14 1938 年王鼎鈞小學停課後，王父設法替他找私塾讀書。期間，王父友人游擊隊領袖見過王鼎鈞後，認為有許多比他小的孩子加入游擊隊，主張他也應該成為少年兵從事抗敵工作。但是王父以孩子年齡還小而拒絕。王鼎鈞曾說，父親認為他如果不受教育，就沒有謀生的能力，沒謀生能力就無法照顧弟妹。參閱王鼎鈞，《昨天的雲》（臺北：爾雅，2005），頁 2。另一位傳主金敬邁的父親是電報員。清末民初，電報業傳入中國，金父年輕時曾被公派到英國學習，打下英語底子。金敬邁很小的時候，父親就會教他簡單的英語，講述在外的精采見聞。抗戰爆發後，全家輾轉從湖北、湖南，最後在四川萬縣落腳，金父在顛沛流離中過世。金敬邁未滿 10 歲，便要上街叫賣燒餅油條，晚上蹲在路邊幫人擦皮鞋；12 歲那年，決定徒步一千多里，離家到不收費的湖北聯中繼續讀書。當時湖北聯中只收湖北籍學生，金敬邁為了讀書，學了幾句湖北話，謊稱自己是失怙失學的湖北子弟，取得省政府教育廳推薦信而得以入學。參閱金敬邁口述，〈老邁的學童生涯〉，收入張鈞主編，《述林 1，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1931-1945 中國往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頁 28-30。又如陳彥增的父親是前線軍人，陳彥增長大後第一次與父親見面是在 10 歲，陳父立刻

並且尋求出版有一定的正面連結。值得注意的是，本文討論的女性傳主崔玖、楊以琳、豐一吟、瓊瑤，雖然是女孩，但是她們得到的教育資源，並不少於家中兄弟。¹⁵ 可以說，比起當時多數普通人家的女孩，他們的父母更願意提供女孩受教育的機會，反映了當時知識階層在教育上追求男女平等的進步心態。由此可知，具有文字書寫能力的知識階層，不但可以為自己留下文字，他們的聲音相對容易形成社會認同的主流文化。不可否認，本文傳主們所描述的戰爭經驗以及對戰爭的感受，明顯與底層、不識字的邊緣群體存在差異。¹⁶

積極安排兒子就學，甚至請部隊裡的特務長教他算數。陳彥增，《難童日記》（臺北：INK 印刻文學，2012），頁 64。另，潘際鑾的父親本人 14 歲便中了秀才，曾進入鐵路學堂，十分重視孩子教育。參見潘際鑾，〈少年漂泊記〉，收入張鈞主編，《述林 1，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1931-1945 中國往事》，頁 13。而成湯的父親則是不願孩子進入偽政府控制的學校就讀，自己另外辦私塾請老師。參見成湯口述，成英姝編輯整理，《我曾是流亡學生》（臺北：聯合文學，2009），頁 46-50。

- 15 楊以琳回憶，家鄉的女孩能上學的並不普遍，她所居住的整條楊家大路，只有她自己和另一名女孩能夠上學，大部分的女性童年玩伴，並不上學，而是成天在家學打扮、學打牌。楊以琳，《夢繞成長路》（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8），頁 38。崔玖的父母十分重視教育。崔玖的父親與母親是在五四運動結識，婚後生下崔玖，取名「玖」是為了紀念五四：五加四等於九。父親崔唯吾，是國民黨人，在孔祥熙延攬下，進入中央銀行擔任中央政治委員會財政專門委員，同時兼任孔祥熙新聞事業中《時事新報》、《大晚報》、《申時電訊社》三家報社的總經理。崔玖口述，林少雯、龔善美執筆，《崔玖跨世紀》（臺北：心靈工坊文化，2000），頁 59-61、75。瓊瑤的父親是大學教授，母親是中學老師；豐一吟的父親是豐子愷(1898-1975)，他們都相當重視女兒的教育。
- 16 不同階層兒童戰爭經驗存在差異。以最近學界出版的一份南京大屠殺倖存者證詞為例，該書中的倖存者，多數為戰時兒童，他們多半不識字，對自己童年遭遇的描述是在接受「為大屠殺留下見證」前提下受

再者，他們選擇公開自傳，讓自己的故事進入大眾視野。決定公開面向大眾的書寫策略表明：不僅為自己寫故事，而且還要寫給別人看。為什麼在已有專業史家撰寫抗戰史的情況下，個人還需要書寫自己的歷史？因為「歷史」對不同的人來說，有各自側重的解讀視角與重要性。王鼎鈞在回憶錄《昨天的雲》裡，強調自己並不是在寫「歷史」，他說歷史如江河，而他的書僅是江河外側的池泊，而「池泊和江河之間有支流相通，水量互相調節。」¹⁷ 他認為大人物、小人物寫回憶錄的角度不同：大人物寫的傳記是給小人物看；小人物不寫回憶錄，即使寫了，大人物也不看；而小人物看似可以隨心所欲地寫回憶錄，但其實真正的「小」人物是沒有聲音的。¹⁸ 王鼎鈞自認非不可一世的大人物，不過他與真正的小人物也存在距離。他寫回憶錄目的在於互補大小人物，調節只記大人物豐功偉業的歷史，讓真正的小人物被世人看見。¹⁹

小人物的歷史經驗應當值得重視，是這些自稱非大人物、創作自傳性作品作者的重要動機。成湯出版自傳《我曾是流亡學生》前，獲得第四屆全球華人部落格大獎的「評審團特別獎」。他在入圍之際寫下感言，認為個人親身遭遇的特殊戰亂經驗，帶給他的是超越自己生命存在的更高價值

訪。他們所描述的童年生活用意在突顯日軍侵略下的悲慘境遇。少有人主動對童年經歷及意義進行思考。參見曾向東、徐康英、朱成山主編，《歷史與記憶：117戶南京大屠殺受害家庭（族）微觀史調查與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

17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2。

18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3。

19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3。

感，而這些價值是不論學歷多高、官位權勢多大者，都不一定能體驗得到的。²⁰ 換言之，以大人物及重要歷史事件為中心的敘述方式，已經不能滿足更多人對歷史的需求。

然而，個人寫歷史，除了「小人物被世人看見」之外，還有心中對「真實」歷史的認定與追尋。陳彥增決意出版《難童日記》，緣自於他讀了一本以「大江大海」為名的中文書後總覺得「不是味道」，嘲諷自己對過往在大陸的那段「舊境」難以丟棄，而且敢「掛保證」自己所言絕不會騙人。²¹ 陳彥增對他人撰寫過去歷史的不滿，並強調自己撰述的真實性，是基於他「親歷者」的身份。陳彥增的說法不僅突顯人們認知歷史的差異性，也反映出不同的歷史詮釋彼此之間具有競爭性。因此，自傳除了展露真實自我之外，有時也夾雜著對自我的幾分打扮，藉此博得大眾青睞。例如，作家瓊瑤出版自傳《我的故事》，自言是為回應讀者對她的追捧與好奇，特意呈現「真實人生中的我」作為回報。然而，如同她在自傳的序裡所言，「別人眼中的我非我，真實人生中的我難以下筆，未來的我不知何在，今天的我仍在尋尋覓覓」，所以能談的我只有過去的我。²² 綜上，這些交織著自我肯定、展現真實自我、替小人物們發聲、再現心中真實的歷史面貌，以及貼近民眾情感認同的自傳性陳述，表現的正是歷史的複雜景緻。

此外，本文討論的童年記憶，除了呈現戰時日常生活經驗之外，傳主的敘事通常夾帶大量的情緒感受。這些沾染情

20 成湯口述，成英姝編輯整理，《我曾是流亡學生》，頁14-15。

21 陳彥增，《難童日記》，頁3。

22 瓊瑤，《我的故事》（臺北：皇冠文化，1989），頁8。

感的敘述，脫離傳統史學對客觀事實的要求，是否有資格視作歷史事實？學界這些年已陸續對情感史研究的重要性展開探討。例如，溝口雄三與孫歌針對中日戰爭歷史為什麼遲遲在兩國之間無法達成共識，指出關鍵在於講求客觀實證的歷史思維，過度執著於客觀數字或數據，致使陷入主客觀二元對立，反而遠離了歷史情感。孫歌認為中日人民之間的鴻溝，不是知識性的，而是情感性的，由於歷史領域一直不能給這種情感性合法的位置，而遭排除在研究者視角之外。他主張事實是附帶某種意義存在於歷史之中，不附帶意義的事實，成不了歷史事實；另一方面，即使是情感記憶，只要在某一脈絡中被賦予意義，就能成為那一意義上的史實。²³ 溝口雄三則提出讓「情感的記憶」承擔更複雜的歷史內容。²⁴ 而王晴佳在慰安婦的研究議題上，也肯定口述證言的情感特性與價值。²⁵ 據此，解讀傳主們充滿情感敘述的抗戰經歷時，

23 孫歌，《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頁65。孫歌的部分看法收入溝口雄三著，王瑞根譯，《中國的衝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頁23-25。

24 溝口雄三著，王瑞根譯，《中國的衝擊》，頁21-46。

25 王晴佳以慰安婦的證言說明口述證詞中的記憶與情感問題。文中論及上野千鶴子肯定慰安婦證言的價值，理由是史料價值的高下，應該以當事人是否有真實的體驗為標準。慰安婦證詞是親身體驗的第一手資料，相較之下，官方檔案反而是間接證據。再以英國語言哲學家約翰·奧斯汀(John L. Austin)的開創性研究指出，語言的使用大多帶有某種意圖或願望，少有平鋪直敘、如實直書的場合。因此，看似不偏不倚的公文，背後也帶有執行目的。就這一點而言，公文資料與夾雜感情與情緒描述的慰安婦證言，具有同樣的性質。所以不應該以史料內容是否有情感的滲入而貶低其價值，將公文價值凌駕於證言之上。以上參閱王晴佳，〈口述證言能否成為歷史證據——情感史研究對近現代史學的三大挑戰〉，《社會科學戰線》，2020年第5期（2020年5月），頁104-117、282。

不但要關注這些敘述所承載的歷史事實，也要正視他們如何賦予過往經歷意義與價值，而這通常與他們的情緒感受密不可分。

再者，撰寫回憶錄的成人雖無法回到童年時代的歷史現場，描繪當年的遭遇卻是歷歷在目。一般人認為回憶會隨著時空改變而產生變化。但研究記憶的史家提出「閃光記憶」說法，指出人們對於造成內心震撼的事件經歷，通常會在腦中形成永久性的記憶，讓他們魂牽夢縈而終生難忘。²⁶ 正是這些深刻的回憶，促成傳主留下自己的戰爭故事，展現個人主動賦予抗戰歷史意義的過程。他們之中有人刻意使用爺孫對話的口吻，²⁷ 或採用長姐向小妹講述家族故事方式，²⁸ 或

26 Lynn Abrams 著，汪正晟譯，〈兼為材料與研究主題的記憶：口述史的變遷〉，《口述歷史》，期14（2016年10月），頁321-323。

27 陳彥增《難童日記》一書，開頭「楔子」是從2011年3月日本311大地震的災難說起。當年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竟把嚴重的「天災」說成「天譴」，為了向他好奇的孫子阿鴻（小學四年級）理解這段過往的來龍去脈，作為爺爺的陳彥增為了他的孫子完成這本書，留下他見證「人禍」的歷史。陳彥增，《難童日記》，頁9-14。

28 楊以琳的《夢繞成長路》一書，大篇幅回憶兒童青少年時期在大陸的生活經驗。一方面以書信體的方式寫信給自己小妹小魚兒（化名），描述家族往事，結合時代動盪；另一方面勾勒回憶的過程中，重新檢視自身兒童、青少年成長經驗的意義。整本書的撰寫緣於來臺生活安定後，思鄉情切在日記本上抒情塗抹。曾經寄給報紙副刊，遭退稿兩次，一度放棄寫作。人生七十之後，學會電腦輸入，在網路上發表文章，獲得年輕人喜愛，在網路文友的鼓勵下持續創作修改。2008年獲選為桃園縣文化局舉辦第一屆「全民寫傳記」。楊以琳強調，《夢繞成長路》雖然寫的是個人故事、家族歷史，但因為涉及大陸地區的家入而有所顧忌，加上年久忘記，因此人名有真假、事有出入、次序有顛倒，因此創作上雜揉小說、散文的風格。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v-vii。

是父女之間的談話，²⁹ 也有以父親為主軸的回憶口述。³⁰ 這些敘述從個人生命史出發的同時，連結了家庭／家族史，並擴展至整個民族、國家歷史，再現抗戰歷史對中國人的歷史意義。

底下討論抗戰如何進入兒童生活，以及他們採取何種態度與方式理解並應對戰爭。藉由分析兒童的日常生活領域，包含私領域的家庭生活和公領域的學校活動，探討從家庭生活走向集體逃難的過程，以及戰時的學習經驗，最後闡述兒童與同伴之間主動創造的戰爭遊戲文化，說明戰時兒童的重要經歷與歷史意義。

二、從個人與家庭、走向集體的歷程

抗戰這件事如何進入傳主們的童年敘事？兒童與成人的不同，不僅是年齡以及思維成熟度的差異，更表現在對事物的觀察點上，它們往往會和成人習以為常的見解形成對

29 成湯的女兒是臺灣知名女作家成英妹。成湯在邁入 80 歲以後，向女兒表示欲將過往經歷寫下的念頭，成英妹建議以設置部落格的方式呈現，由父親口述，成英妹負責打字。部落格「爸爸媽媽姊姊妹妹，還有毛毛」寫了三個月後，報名全球華人部落格大獎，入圍決選，最後獲得第四屆全球華人部落格大獎評審團特別獎。《我曾是流亡學生》即是此部落格內容的出版。成湯口述，成英妹編輯整理，《我曾是流亡學生》，頁 5。

30 《豐一吟口述歷史》一書雖以豐一吟為書名，受訪人也是豐一吟，但其訪問主線是「陪伴父親的歲月」，以豐子愷為中心進行回憶口述。內容與豐一吟本人所撰《爸爸豐子愷》一書，高度重疊。參見豐一吟口述，周崢嶸撰稿，《豐一吟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豐一吟，《爸爸豐子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

比。兒童最初對戰爭獨特的感受可能與家庭生存、救國抗日毫無關連，迥異或違反一般人對戰爭的既定印象，甚至是新鮮有趣的經驗。但另一方面，兒童生活離不開家庭，家庭是兒童生活場域的中心。兒童以家庭成員的身份，一同與家人經歷戰爭，體驗生離死別的痛苦。兒童通常在依附以家庭為單位的逃難過程中，加入更大的難民群體，領略從個體、家庭再到集體的戰爭經驗。藉由將戰爭作為觀察面向，兒童在社會化的進程中，正好表現出從陌生、邊緣的個體位置，逐漸向主流群體的認同靠攏。其中，國族意識的形成就是一項重要指標。

（一）接觸戰爭的最初印象

兒童對抗戰這件事最早的記憶有著什麼樣的特點？作家瓊瑤回憶自己對戰爭的第一個記憶，³¹ 源自一件芝麻綠豆般的小事：一面小錦旗。這故事敘述在瓊瑤父親所任職的學校，舉行運動會的那天，操場上掛滿了繽紛的小錦旗。目光受到吸引的瓊瑤，固執地要求母親取下一面錦旗送給她，瓊瑤因為母親的拒絕而哭鬧不休，引起父親的不悅。父親的一位同事及時出面打圓場，要求她表演一支歌舞作為交換。原本個性靦腆的她，在強烈的欲望驅使下，害羞地完成表演。

31 瓊瑤，1938年出生。原名陳喆，著名愛情文學作家兼編劇。父親陳致平是歷史教授，母親袁行恕，出生書香門第，曾入北平藝專就讀，擔任過中學教師。1947年12月生平的第一篇小說《可憐的小青》在上海《大公報》之現代兒童版以「鳳凰」之名發表。1949年來臺，就讀初中、高中期間，已在報紙、文藝雜誌上發表文章。1963年7月，在《皇冠》雜誌發表半自傳體小說《窗外》，開始在文壇走紅，至今仍持續創作。她的言情小說，經常翻拍成膾炙人口的電視劇、電影。

得到錦旗的瓊瑤喜不自勝，如獲至寶般地珍藏著，就連逃難時也隨身攜帶。直到某天逃難途中，母親打包行李時，告訴她外面到處是洗劫財物的日本兵，她因為害怕錦旗被日本人搶走，決定交給母親鎖進木箱，存放在某戶農家的閣樓。³²從此錦旗不復見，取而代之更重要的故事是：她和家人為了躲避日軍而展開一連串危險的逃難生活。

無關緊要的「小錦旗」，象徵兒童世界的單純以及與外界的隔絕，經由成人告知她打家劫舍的日軍，開始打破封閉的世界，連結上成人所認知的「真實」世界。害怕小錦旗被奪走的恐懼，又事先從大人言談中接受了日軍的殘暴，這些都在瓊瑤跟著家人正面遭遇日軍時，得到證實而再度加強。因此，當她日後遇到「人性」尚存的日本軍官出手相救，全家人意外死裡逃生時，作為孩子的她，既不敢置信也無法理解。而是直到成人之後，她才肯定同樣生而為人的日本軍人，也有家庭、有妻兒，當然也有人性。³³

另一位作家楊以琳與瓊瑤有著類似的認知經驗，³⁴ 她們對日軍殘暴的認識最早來自成人的告誡。楊以琳童年的第一個戰爭記憶是「纏足」這件事。抗戰爆發時楊以琳已經 9 歲。她的母親聽信謠傳，認為日本人只殺害讀書人，對文盲、苦力及纏腳婦女不趕盡殺絕，因此毫不猶豫地替女兒纏腳。導致楊以琳無法行走而遭到弟弟的嘲笑，姐弟兩人整天吵架終

32 瓊瑤，《我的故事》，頁 8。

33 瓊瑤，《我的故事》，頁 32-33。

34 楊以琳，1928 年生，江蘇省徐州市人。曾任職臺灣國立華僑中學、私立東海大學、北一女中等校教職二十年，及美國 Marriott Corporation Data Entry 十四年。

於引起父親注意，楊父知道後氣得逼著妻子替女兒放了腳。³⁵ 戰爭最初對女孩日常生活造成的影響，是纏足帶來的身體疼痛、行動不便與嘲笑，和日軍沒有直接的關係。這說明兒童對日本與抗戰的認識，更多是來自周圍成人的言談與教導。值得注意的是，纏足對女孩來說，深具性別上的意義。楊母原以為纏足可以替女兒避開日兵，但是母親在女孩的身體上標誌出與男孩的差異，等於提醒女孩，比起男孩，她們更需要注意自己身為女性的身體容易成為日軍攻擊的目標。這反而促成了女孩開始去意識到作為「女人」性別身分的特殊性，以及在戰爭下可能遭遇的處境。

不同於戰爭給人感到痛苦、悲傷、憤怒的既定印象，傳主們最初回想自己是如何經歷戰爭時，經常是以興奮、好奇與新鮮的真實感受，拉開回憶的序幕。有些孩子跟著成人逃難時，一開始懷抱的是興奮的心情。例如陳彥增在母親帶著他從北平南下安徽時，³⁶ 因為可以搭上「迷人的火車」而高興不已。他回憶自己捨不得放過窗外變化不停的景致，不肯閉目睡覺，就連肚子餓都能忘記。³⁷ 而王鼎鈞在戰火延燒到家園前夕，³⁸ 和父母、弟妹們從蘭陵逃到南僑外婆家避難，並

35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40-41。

36 筆名陳彥增的陳橋，出生於1934年，初中就讀揚州中學，未畢業即輟轉於1949年來臺，1954年進入臺大就讀經濟系，1958年畢業，1964年再取得臺大哲學系學士學位，後進入中興大學任教於企業管理系，至1999年退休。

37 陳彥增，《難童日記》，頁28。

38 王鼎鈞，1925年出生，山東省臨沂縣蘭陵鎮人。華文界的散文大師，被譽為「一代中國人的眼睛」。抗戰末期初中畢業後從軍。1949年到臺灣。曾經在中國廣播公司寫稿，從事電視劇寫作，主編各種刊物、報紙副刊。1978年移居美國。1999年，以《開放的人生》入選「臺灣

不覺得在逃難，以為是「搖到外婆橋」，進行一趟小旅行。³⁹

在沒有真正地體驗到戰爭的殘酷以前，孩子們對逃難、飛機轟炸、日本軍人，並不感到害怕，更多是出於好奇。不過，往往在親身經歷後，在感受上形成強烈反差。⁴⁰ 以轟炸經驗為例，王鼎鈞回憶當他和家人離開故鄉逃到宿遷城的教會時，一開始聽到警報器響起，他還好奇地跑到大門外，探頭向天空張望，看看有沒有警報球，卻被怒氣沖沖的大人拖回屋裡。⁴¹ 他和父母在教會躲了五天平靜的生活後，終於在第六天找到機會出門蹣跚。沒想到在第七天，警報從午後到傍晚響個不停，這是他第一次體驗整個人失去知覺的痛苦，到最後覺得死了跟活著沒什麼兩樣。就是這一次的恐怖經驗讓他嚇破膽，再也不敢隨意擅自行動。往後幾年，每當無意間聽到汽車的馬達聲，他便會不由自主地被嚇得魂飛魄散。⁴²

豐一吟也有相似的經驗，⁴³ 描述對轟炸從有趣到恐懼的

文學經典三十」。2001年，獲得北美華文作家協會「傑出華人會員」獎牌。2014年，獲得第十八屆國家文藝獎。寫作歷史長達八十多年，著作四十多部。在他創作一生中最念茲在茲的是撰寫回憶錄四部曲：《昨天的雲》、《怒目少年》、《關山奪路》、《文學江湖》。

39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120。

40 轟炸不僅對兒童心理造成創傷，對成人的刺激與影響也相當深遠。可參閱張瑞德，〈在轟炸的陰影下——抗戰時期重慶民眾對空襲的心理反應〉，收入林麗月主編，《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頁261-278。

41 根據王鼎鈞的回憶：小地方發布空襲警報，會派人沿街敲鑼，在大城市則是由強壯的人丁手搖發電一種類似轆轤的東西，待轆轤轉動到某一速度，警報器便開始嗚嗚地響。除了警報器，還有警報球，一顆球是預報警報，兩顆球代表緊急警報，三顆球則是解除警報。王鼎鈞，《昨天的雲》，頁146。

42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154-155。

43 豐一吟，1929年出生於浙江省崇德縣石門鎮。著名藝術大師、散文作家豐子愷幼女。曾就讀國立藝術專科學校、中蘇友協俄文學校。幼年

心理變化過程。1937年11月6日，日軍轟炸浙江石門鎮，豐一吟當時是五年級的小學生。她早上出門上學，抬頭望見日軍偵察機低空掠過，下午上課時間便遭遇轟炸。老師與同學紛紛奪門而出，逃往校外，豐一吟也往家裡奔去。她一回到家中見四下無人，正感到納悶時，爸爸豐子愷從供桌底下探頭出來，接連發現外婆、媽媽、哥哥姐姐們全都躲在桌子底下，還把棉被頂在頭上。豐一吟見狀，差點笑出聲來。她回想起第一次遇到轟炸，一開始還覺得挺好玩的。⁴⁴ 實際上，石門鎮當天因為日軍轟炸慘死的民眾就有三十多人，豐子愷大受震撼，決定攜家帶眷展開逃難。豐一吟回憶在逃難的日子裡，只要警報一響，人人都成了驚弓之鳥。有一次，她意外目睹轟炸遇難的殘肢遺體，嚇得半夜睡不著覺，為此還遭到父親一頓痛罵。豐一吟老年憶起這段經歷時仍然心有委屈，認為父親對待年幼的她未免太過嚴厲。⁴⁵

上述這些傳主們有意識地記錄自己從好奇或有趣，再到害怕、驚慌失措的情緒轉變，呈現兒童逐漸接受戰爭改變原有日常生活型態的歷程。那麼傳主們是如何賦予這些事件意義？底下以成湯為例，⁴⁶ 說明他的個人戰爭經驗是如何從兒

遭逢抗戰，跟著父母逃難，戰後一直陪伴豐子愷，協助從事翻譯等工作。曾任上海市作家協會會員、上海市翻譯家協會會員、上海市文史研究館館員。1980年代起，致力於豐子愷研究工作，並擔任豐子愷研究會顧問。

44 豐一吟口述，周崢嶸撰稿，《豐一吟口述歷史》，頁25-26。

45 豐一吟口述，周崢嶸撰稿，《豐一吟口述歷史》，頁67。

46 成湯，1928年出生，江蘇興化人。1949年來臺後，曾於中學及專科學校任教40餘年。工作間學習國畫，融合多種水墨畫並創造流動技法，抽象山水畫獨樹一格，曾入選「世界華人書畫展」、國立臺灣藝術教育館主辦「2000年中國當代水墨新貌」等，並多次舉辦個人作品展。

童好奇的視角，轉向害怕並且敵視日本人，強化對民族的認同，而在邁入老年後，重新整理並反思這段經歷的過程。

故鄉在江蘇省興化的成湯，11、12歲時，日本的勢力已經發展到蘇北。有一天，他正在家中後院玩耍，幾個日本兵突然闖進來，把抓來的雞活剝割肉後，放進便當盒。這些被割肉的雞一時還沒斷氣，在地上掙扎竄逃，成湯在一旁看得出神。這時，日本兵發現少了一個便當盒，認定是他拿走，要求他平舉雙手身體貼牆，對他進行搜身。後來便當盒被找到了，但是搜身的日本兵卻甩了他兩個耳光後才離開。⁴⁷

頓時，成湯覺得自己受到了極大的侮辱，內心氣不過，趁著黑夜帶著筆墨，偷偷跑到日本人種植蓖麻的地方。日本人當時在興化縣城空地大量栽植蓖麻，蓖麻籽經過提煉成油後，用以取代汽油。這些地方通常會立上一個牌子，寫著「大日本株式會社」。成湯就在這些牌子的「大」字上多加一點，變成「犬」字。他完全沒想過這樣做有多麼危險。第二天，日本人立刻封鎖縣城，抓走了許多人，這些人從此再也沒有回來過。成湯因為自己的憤怒導致這麼多人遇害，在心中投下巨大陰影，直到晚年，心中的罪惡感與恐懼仍未減輕，一想到這件事便夜不能寐。⁴⁸

成湯因為遭到日本兵打了耳光，轉向對當地日本企業的報復。值得注意的是，他被點燃的民族情感，夾雜著私人受辱的情緒。成湯在老年提起這一段經歷，有更多的反省是面對自己不當的情緒發洩。日本帝國侵略行為造成民眾無辜受害，但是個人也有應負的責任。因此，他在老年回憶童年抗

47 成湯口述，成英姝編輯整理，《我曾是流亡學生》，頁18-19。

48 成湯口述，成英姝編輯整理，《我曾是流亡學生》，頁19。

戰經歷時，對「戰爭」這件事的複雜性有著更多的觀察與反思。例如，他回憶當年雖然「還小，不懂事」，但看見「偽軍」隨意毒打佣人、虐殺百姓，感受到「那是一種殘忍、可怕、受壓迫、生命沒有保障的世界」，而在心中加深了對日本人與漢奸的痛恨。⁴⁹ 可是除了日軍侵略的惡行，他描述家鄉百姓在戰爭期間遭受的悲慘境遇時，也指出國家內部因為戰爭被激化的各種權力爭奪：土匪、漢奸、游擊隊與國共兩黨。⁵⁰ 在他眼中的農民百姓，無權無勢受欺凌者，才是他童年戰爭生活中最值得同情與記錄的對象。

（二）面對親友生離死別

成人習慣性地認為，兒童因為年紀幼小而無法清楚記得或正確感知生命中發生過的重大事件。但是我們從傳主的描述可以觀察到，長大後的成人對於某些童年事件的經歷，有著相當清晰的記憶，甚至是歷久彌新。或許當下經歷創傷的兒童，無法完整地表達自己的感覺與認知，但是成年後的傳主卻有力量賦予過去的感受清楚的解釋與意義。而正是這些被書寫下來的記憶，使得我們有機會認識兒童的戰爭經歷。

10 歲以前的陳彥增，對父親的記憶非常模糊。因為父親是保家衛國的第一線軍人，在他成長過程中長期缺席。直到 1943 年，母親決定帶著他從北平南下安徽尋父，他才真正看清楚自己父親的模樣。父子倆見面前一刻，父親才剛從前線和敵人結束一場殊死戰。遺憾的是，此刻勝利歸來的父親，在短短的四個月後，不幸戰死沙場。這段時間，陳彥增身邊

49 成湯口述，成英姝編輯整理，《我曾是流亡學生》，頁 27。

50 成湯口述，成英姝編輯整理，《我曾是流亡學生》，頁 26-27、30。

所見所聞，盡是生離死別的故事：經歷學校同學在一夕間家破人亡；一位奉父親命令看顧他的士兵，橫遭匪徒劫殺身亡；照顧他日常吃穿的小兵，原來是一個被強行拉進部隊，被迫與家人分離的娃娃兵；和父親一同戰死的同僚，留下像他和母親一樣孤立無援的軍眷。這些悲歡離合的故事，成了他戰火童年生活的主旋律。

陳彥增作為一個孩子，是如何面對這些一個個消失在身邊的親友呢？1943年5月，剛入小學的陳彥增，正在學校接受防空演習訓練。他回憶學生們對演習經常不以為意，認為演習不過是做假，做做樣子敷衍了事。沒想到當真的轟炸來襲時，班上同學的雙親遇害身亡，帶給他極大的震撼。轟炸當天，陳彥增和同學們都躲在防空壕裡，看著一架架飛機俯衝丟下炸彈，著地後發出轟隆巨響。轟炸地點雖然遠離學校，教室的窗戶仍然被震得嘩啦響，約莫過了一節課的時間，警報才解除，幸好全校師生在轟炸中平安度過。學校決定提早放學，並且要求學生直接回家，不准到鎮上逗留並觀望被轟炸的地方。回家的路上，陳彥增還可以看到四處冒著黑煙，聽到急促的鑼聲不時發出救火訊號。⁵¹ 隔天，他得知班上同學方楚才沒來上課，原來方家五口人，父親和祖母在轟炸中當場身亡，母親燒傷過重，被抬到救護站後也沒能救活，全家人只剩下方同學和他姐姐在學校而逃過一劫。最後，校方出於無奈，只能通知方家徽州的遠房親戚來接走方氏姐弟。⁵²

事發不久，陳彥增與母親又跟隨部隊移動到徽州城，離開了原來的小學。儘管他在這所小學待不到一個學期，一到

51 陳彥增，《難童日記》，頁64。

52 陳彥增，《難童日記》，頁66。

徽州，陳彥增立刻想起在轟炸中失去雙親的方楚才，央求母親讓他去找這位同學。母親告訴他，徽州城裡那麼多人家，上哪裡去找，如果方同學轉運了，說不定會碰上好人家。陳彥增不死心地追問，要是他沒有轉運，沒碰到好人家呢？母親只好回他：「在這兵荒馬亂的年頭，誰不是連自己都照顧不過來？人到了沒法子的時候，也只有狠下一點心來了。」⁵³ 儘管陳彥增從此沒再見過方楚才，方楚才的遭遇卻永遠烙印在他的心中。

陳彥增在回憶過程刻意採用「兒童」口吻與第一人稱敘述，拉開與成人世界的距離。我們清楚觀察到兒童關懷他人的能力，表現誠摯的同情心，不同於成人面對戰爭時以現實作為最大的考量。陳彥增利用「兒童」身份鏗而不捨地追問大人，他所關心的人最後的下場，間接點出背後更沉重的思考：戰爭造成大量流離失所的人，最終他們都活下來了嗎？活下來的人，又活成什麼樣子了？誰來關心他們戰後的人生？誰能夠為這場戰爭所造成的傷害，真正負起責任？還有誰會記得這些普通人呢？因為戰爭而被犧牲的無辜群眾早已數不清，他們的遭遇在當時無法被認真看待，日後更不會有機會被寫進宏大的歷史敘述。成千上萬的戰爭受害者是一群沒有面孔的群眾，最終在史冊中被濃縮為一筆，簡單帶過。正如王鼎鈞所言，在煌煌歷史巨作「那些書裡有天下，沒有蒼生」。⁵⁴ 而傳主們有意識揀選身邊這些無足輕重的小人物，細說他們的亂世遭遇，目的之一就是照亮史家未能觸及的「死角」。

53 陳彥增，《難童日記》，頁77。

54 王鼎鈞，《怒目少年》（臺北：爾雅，2005），頁5-6。

另一位對生離死別有著強烈感受的兒童是瓊瑤。瓊瑤 6 歲時跟著父母從湖南逃往後方。逃難途中，瓊瑤母親差點遭日軍強行擄走，呼天搶地之際，幸有一位日本軍官伸出援手，逃過一劫。⁵⁵ 後來在險象環生的逃難過程中，陰錯陽差與兩個弟弟走散，導致瓊瑤一度獨自面對父母親崩潰的情緒。當時她的母親一心尋死，父親不但攔不住，竟然選擇跟著妻子一起投河。瓊瑤回憶自己當時年紀雖小，卻已經深深體會「那份淒涼，那份悲痛，和那份絕望！」⁵⁶ 母親曾問她，要不要跟著他們一起死？瓊瑤聽了心裡一陣酸澀，知道再也見不到弟弟，但她也疑惑：自己只有 6 歲，哪裡明白「死」的真正意義？可是既然跟定了父母，父母要「死」，她哪有不死的道理。瓊瑤點頭答應母親的要求，和父母一起哭著走向河邊自盡。⁵⁷

投河過程中，瓊瑤看著父母彼此凝視，淒然地擁吻在一起，從岸邊的斜坡一同滾進河裡，父親接著把母親的頭按入水中，兩人逐漸不再動彈。瓊瑤見狀開始著急，小心翼翼又搖搖晃晃地走向急流，河水漸漸淹沒了她的小腿、膝蓋、腰部。當她再也無法站穩時，跌坐水中，水深及頸，激發了她的恐懼，驚嚇地大聲哭喊爸爸媽媽。眼淚迷糊之際，瓊瑤看見母親移動身體。母親出於本能要保護孩子，伸手拉住瓊瑤的腳，在孩子的哭喊聲中清醒過來。母親一句「不能死！我們死了鳳凰怎麼辦？」三個人哭成一團，緊緊地擁抱在一起，

55 瓊瑤，《我的故事》，頁 28-33。

56 瓊瑤，《我的故事》，頁 70。

57 瓊瑤，《我的故事》，頁 73-74。

再從水裡爬上岸邊。⁵⁸

瓊瑤與父母經歷「死而復生」後，再度踏上逃難路途。途中，母親有時忍不住哭喊弟弟們的名字，三個人便停下來相擁哭泣，哭完了再繼續前行。這段旅程中，瓊瑤的喉嚨始終哽咽著，不敢哭出聲，她深怕自己一哭，父母親又要尋死。她甚至反省自己，平日喜歡和弟弟吵架，爭論男女平等，然而此刻的她想起的全是弟弟的好。她暗自發誓不止一千萬次，今生如果能再和弟弟們重聚，將永遠讓他們、愛他們、寵他們。⁵⁹ 事實上，弟弟們只是被認識的軍長帶往後方，並未走丟。這段戰爭中親人失而復得的經歷，對瓊瑤一家人來說卻是彌足珍貴。

瓊瑤這段充滿情感的童年敘述，正好與成人立場形成強烈對比，呈現「兒童」視角下的父母之愛。誠然，父母愛其子女，將子女視為生命。所以當父母失去孩子時，哀莫大於心死。但是從孩子的角度來看，他們對父母義無反顧的愛，何嘗不是真心實意。當一位母親因為失去兒子，詢問年幼的女兒願不願意跟著自己一起自盡時，她只想到自己的悲慘遭遇，並沒有考慮到女兒所承受的痛苦。女孩不僅痛失手足之愛，還承擔著父母失去兒子的悲痛情緒，再拚上自己寶貴生命與父母同歸於盡的同時，又要忍受失去父母疼愛的苦痛。兒童所承受的壓力，一點也不比父母少。

值得注意的是：瓊瑤對兒時戰爭經歷的描述，充滿著戲劇性的情節。事實上，這正是她自傳書寫的筆調，也是她本

58 瓊瑤，《我的故事》，頁 73-74。

59 瓊瑤，《我的故事》，頁 73-74。

人所承認的生命風格。⁶⁰ 同時，又與她所撰寫的愛情小說，以及編導的電影、電視劇，有著高度的「同構性」：構築曲折起伏的故事，以飽滿的情緒張力堆疊成強烈的衝突，最後激發出真誠與純潔的愛。一如她在烽火亂世下的跌宕成長，最終是爲了品嚐人間彌足珍貴的愛與感人的偉大情操。不可否認，這些描繪有部分是她極欲展現在大眾面前的自我形象，但也是她對自己過往生命經歷的熱情回應與肯定。

（三）從家庭到集體的受難體驗

家庭是戰時兒童參與逃難的最基本單位。中國家庭在日本侵略時期承受著不同程度的刺激、動蕩與傷害。王鼎鈞和楊以琳，在日軍進攻之際隨著父母逃離家園，等待兵禍告一段落回到老家，發現家園破落，面目全非；崔玖、潘際鑾、豐一吟、瓊瑤與金敬邁，則是隨著父母逃往後方，輾轉流亡各省，幾乎都嚐過貧病交迫的滋味；陳彥增一家人四散各方，直到抗戰結束也沒能團聚過。在逃難的過程中，兒童跟隨家人加入難民隊伍，一同經歷敵人侵略，滋長了民族意識。正如作家瓊瑤所言，她的童年教育來自戰爭，她的國族觀念，就是在敵人的槍口下建立起來。⁶¹ 她本人在戰爭中與家人幾番死裡逃生的遭遇，以及父母與祖父深刻的仇日思想，不斷增強她身爲中國人的民族意識。可以說，整部國家抗戰歷史，是以家庭／家族戰時生活史爲基調而得以建構形成。

60 瓊瑤本人也承認，自己的人生遭遇，幾乎都是戲劇化的。參閱瓊瑤，《我的故事：增訂版》（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9），頁2。新版與舊版在童年經歷敘述上並無二致，新版添加的部分是她與第二任丈夫平鑫濤的故事。

61 瓊瑤，《我的故事》，頁47。

楊以琳的例子正好說明兒童和父母以家庭為單位的生活，經由逃難進入到集體的過程。1938年5月徐州淪陷時，楊以琳10歲。即使邁入晚年，她依然記得日軍攻陷徐州後的恐怖氛圍。在日軍進攻的某個晚上，她的父母正在猶豫逃往何處時，她的弟弟帶來消息，告訴大家隔壁巷子的徐奶奶，正準備帶著左鄰右舍到基督教創辦的正心小學避難。這個消息使得楊以琳的父親下定決心，催促妻子帶著兒女先逃往正心小學，堅持獨自留守家園。很快地，一向平靜的小家庭，立刻面對戰爭帶來的分離。她的母親起初不同意，哭著說一家人死活都要在一起。⁶²但正是楊父的決定，最後一家人得以保全性命。

據楊以琳描述，母親帶著她和弟弟逃難到正心小學時，夜幕已黑，人滿為患，教室裡擠滿襤褸不堪的逃難者。她們被安置在樓梯口，母親倚牆而坐，弟弟就睡在母親懷裡。深夜裡大砲聲音突然響起，震碎玻璃，孩子全都哭嚎了起來，恐懼的母親們用顫抖的手掩住嬰兒的嘴。接近黎明時分，坦克、火炮與飛機齊聚進攻，巨大的響聲碾在心上，楊以琳感覺到整個天地都在發抖，令人驚恐。楊以琳慶幸自己還能安全地躲在母親的臂彎裡。當一切聲停止之後，正心小學的大門被撞開，劫後餘生的難民如潮水般地湧入，他們驚慌失措地哭喊著，就像一群「被野狼追趕的羔羊」。⁶³幸運的是，楊以琳的父親也在此時進到學校，在擁擠的人群中找到妻兒。⁶⁴

62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44-46。

63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44-47。

64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47。

難民們帶來許多日軍殘殺中國人的消息。楊家祖塋所在地黃集與附近的山谷，據說有三、四千名老百姓遭到日軍屠殺，屍骨推積如山。幸虧她的父母當初決定到基督教小學避難而逃過一劫。遺憾的是，家中的老長工韓大爺夫婦，因為選擇躲到黃集避難，從此下落不明，音訊全無。⁶⁵ 在這短短的一天，楊以琳已經領略死亡的威脅，體驗朝夕相處的親友在一夕間消失，真正地認識戰爭帶來的殘酷。

楊以琳第一次直面日本軍人的恐懼，是夾在一群難民當中。在侵略的槍砲聲停止的午後，美籍校長榮我華帶著兩個日本軍人進入校園巡視，日軍全副武裝帶著刺刀，就像「豹子入羊群」。躲在人群中的楊以琳，雖然在母親的保護下，卻永遠忘不了現場群眾就像是可憐的萬隻羊群，大氣不敢出一下，連吃奶的孩子也不敢哼一聲。⁶⁶ 在場所有人的噤聲，在她心底留下衝擊，讓她永遠忘不了民族集體受屈辱的情緒。她自述直到老年，不敢看賽珍珠小說改編的電影《大地》，或是《怒吼吧！中國》這類觸及民族情感的戲劇作品。有一次她不小心看了賽珍珠小說改編的電影《龍種》，一連做了好幾天的噩夢。⁶⁷

不僅僅是楊以琳，其他兒童認識戰爭的過程，也都可以從個人與家庭，再擴展到學校及社會其他群體的模式來觀察。例如：王鼎鈞和家人在逃難過程中，一度加入陌生的難民隊伍，經歷過無頭蒼蠅式漫無目的逃難；他與父親後來還進入游擊隊，因為年齡小而被指派去跑腿打雜。瓊瑤一家人

65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 47、57。

66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 42。

67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 47。

和大批難民同行，荒野炊飯度日，天為棉被地做床，搭乘過裡外、上下塞爆難民的逃難火車。陳彥增跟著母親及一群軍眷們同行，隨軍隊轉移各地，每天煎熬地等待前線傳來丈夫或父親作戰的消息。豐一吟和家人輾轉流離到後方，寄住過不同親友的家，崔玖、金敬邁、潘際鑾也有相似的經歷。幾乎所有的傳主都是在逃難過程中感染了集體反日的情緒——尤其是面對故鄉親友的不幸遭遇，以及受日本軍人迫害的恐懼與憤怒，形成強烈的民族意識，選擇堅守抗戰信念。擁有共同的感受與經歷，是奠定民族共同體情感與歷史的基礎。擁護並認同抗戰的正面意義，並由此反思如何將戰爭苦難轉化成有意義的生命價值，是成長於戰爭一代的人共有的特質。

三、兒童對家庭的物質與精神貢獻

人們傾向於認為兒童的存在是作為被照顧者與消費者的角色，因為他們缺乏獨立自主的能力。相對於成人的生產者角色，兒童的重要性尤其容易在戰爭史中受忽略。事實上，進入現代社會以前，歷史上的兒童協助成人進行各種家務勞動，一直是他們在家庭裡扮演的重要角色。世界各地大部分的兒童，除了少屬上層階級，在現代學校制度尚未常規化之前，只要達到成人認定的「懂事」階段就可以協助成人進行簡單的日常家務操作，從小就開始學習分擔各式各樣的雜務。⁶⁸ 抗戰期間，絕大多數的中國兒童也不例外。從成人眼

68 大衛·蘭西(David F. Lancy)著，陳信宏譯，《童年人類學》(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7)，頁367-420。本書指出，工作在前現代兒童生活

光來看，父母親給予兒童成長過程需要的物質與親情關愛。但若是從兒童的立場出發，孩子們不僅主動分擔家庭雜務，而且對父母與手足積極付出愛與關心，甚至和成人一同承擔戰爭帶來的精神壓力。

（一）勞動奉獻

抗戰時期的中國兒童，尤其是長子與長女，經常要負起照顧弟妹的責任，兼做各種家務，以間接或直接方式參與經濟生產。最糟情況是在家中支柱傾倒的情況下，撐起養家的責任，甚至獨力養活自己，⁶⁹ 例如 1930 年出生的金敬邁。⁷⁰ 抗戰爆發後，金敬邁的父親帶著一家人輾轉從湖北逃到湖南等地，最後在四川萬縣落腳。1942 年金父過世，家中頓失經濟依靠，供不起孩子上學。未滿 10 歲的金敬邁，白天上街叫賣燒餅油條，晚上蹲在路邊幫人擦皮鞋，以微薄收入貼補家用。⁷¹

占中心地位，並且構成其身份認同。兒童從「懂事」開始，便以遊戲心態或簡單操作方式加入生產行列。進一步將童年與從事有價值的工作兩者間劃分開來，其實是現代社會才有的觀念。

- 69 在南京大屠殺中失去父母而倖存下的兒童，其中不少人有被迫提早進入社會工作的經驗，或是獨力養活自己。例如 1928 年出生的常志強（男），父母被日軍槍殺，靠著拾柴、挖野菜、到工廠做童工，養活自己和年邁的祖母。參考曾向東、徐康英、朱成山主編，《歷史與記憶：117 戶南京大屠殺受害家庭（族）微觀史調查與研究》，頁 11-17。
- 70 金敬邁（1929-2020），軍旅作家，廣東首屆終身文藝成就獎得主。1949 年加入中國人民解放軍。1965 年出版長篇小說《歐陽海之歌》一舉成名。該書主角苦難的童年生活揉合了作者親身經歷，作者本人讀後也流淚。書中引用不少毛主席語錄，成功塑造共產主義戰士的崇高形象，發行量高達三千萬冊。
- 71 金敬邁，張鈞主編，《述林 1，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1931-1945 中國往事》，頁 28。

本文討論的案例主要是出身於知識階層的兒童，最常見的情況是協助父母參與各種雜務工作。例如王鼎鈞在抗戰初期，跟隨父母逃難，離開老家山東蘭陵。此時的他已經 12 歲，正就讀小學高年級，能夠沿途協助父母照顧弟妹。他回憶一家大小逃難的狼狽情景：母親因為纏過小腳，必須拄著一截竹竿奔波，行動較慢；最小的弟弟還在說話含糊不清的階段，由父親抱著走路，經常把父親累得氣喘吁吁，大汗淋漓；至於妹妹的年齡，剛好可以和王鼎鈞吵架，雖然走起路來不輸給他，但是常常坐在路邊喊累，王鼎鈞的任務就是看緊妹妹。⁷²

在王家人逃難最艱困的時候，甚至曾經靠著王鼎鈞乞討來填飽肚子。當他聽到一同逃難的顧大娘爲了替大家節省開支，聲稱自己是難民所以討飯不丟人時，心裡躍躍欲試。⁷³有趣的是，王鼎鈞要去做乞丐，父母親並沒有出聲反對，但是他們的家僕魏氏兄弟，卻因爲主人家的兒子出門乞討而自尊心大受打擊。⁷⁴

兒童不像成人有形象包袱，沒有成人長期社會化後受制於外界的眼光。對王鼎鈞來說，反而認爲乞討是一件「浪漫」的事，並且自嘲這是日本鬼子給了他特准行乞的執照。他仔細地記下當乞丐的行頭：打狗棒與要飯包。顧大娘特地爲他砍下一棵荊棘，修剪成傘狀的防禦武器，好讓他對付專咬陌生人的看門犬。王鼎鈞第一天要飯相當成功，得到一張熱騰騰的玉蜀黍煎餅。他回憶這食物在當年是很大方的施捨，主人家一般只願意給一小片冷煎餅，通常還是兩三天前的剩

72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 122。

73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 129。

74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 137-138。

餘。他興奮地認為這是「此生第一次憑自己的能力報效家庭」，連忙捧著它疾行回家，向父親獻上所得。⁷⁵ 從王鼎鈞的身上我們可以感受到兒童急切被父母肯定的渴望。對他們來說，能夠為家庭奉獻一己之力是獲得成就感的重要來源之一。兒童從事這些勞動時，天性上帶著遊戲的心情，不像成人面對工作時態度嚴肅而且心情沉重。

以遊戲的心態在物資極缺乏的情況下，替家人張羅食物的例子還有潘際鑾。⁷⁶ 潘家從 1938 年起，便一路從老家九江，逃往泰和、衡陽、桂林及昆明。⁷⁷ 一家人逃到湖北時，恰逢雨季，長江淹大水，魚群聚集在家門口。白天，潘父雇用小船到城裡上班，小孩在家沒事就自由玩耍。哥哥們用紗布做網子撈魚，替不滿 10 歲的潘際鑾做釣魚竿，讓他坐在門口釣魚。捕撈起來的魚，就交由母親醃漬，油炸後成為家裡的食物。⁷⁸

潘家逃到桂林後，父親的工資銳減，根本買不起肉，平日裡連想買食物也不容易。當家裡沒東西可吃的時候，潘際鑾和二哥就跑到當地擺夷族人在山裡種植的果林，偷摘水果或盜挖筍子回來吃。長時間吃不到肉，有次實在是忍不住了，二哥出主意到老百姓家裡偷雞，由潘際鑾在後面把風。潘父

75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 95、127-131。

76 潘際鑾，1927 年出生，江西瑞昌人。1944 年考入西南聯大機械系，1946 年轉入清華大學機械系，1948 年畢業後留校任助教。1950 年到蘇聯學習焊接技術，1953 年創立哈爾濱工業大學焊接專業，是中國大陸焊接領域的開拓者與奠基者。1980 年當選中國科學院院士。

77 張鈞主編，《述林 1，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1931-1945 中國往事》，頁 12。

78 張鈞主編，《述林 1，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1931-1945 中國往事》，頁 373-374。

一向管教嚴厲，不准他們拿別人家的東西。但是這次母親卻心疼兒子餓肚子，把偷來的雞給煮了。父親一回來發現家裡有雞吃，很不高興，卻什麼也沒說。⁷⁹

後來潘際鑾的父親失業，家裡供不起他讀書。潘際鑾便輟學到姐姐工作的汽車修理廠當臨時工，負責倉庫登記工作。他趁著沒事的時候就把高中課本拿出來讀，就這樣把高一、高二的課本讀完。母親擺香煙攤子貼補家用時，也要求他幫忙賣煙。潘母還想出一個辦法，讓他穿上兵工廠的制服冒充職員，搭火車可以不用買票，並且特意選在晚上讓他坐火車到遠一點的村子戲園門口兜售水果。但潘際鑾看上去年齡實在是太小了，有次遭到火車檢查員認出是個假冒穿制服的小孩。⁸⁰

面對孩子乞討、偷食物，甚至是逃避買車票的行爲，王鼎鈞和潘際鑾的父親們有著類似的處理態度。他們的父親都是受過傳統士人教育的知識階層，表面上端著中國式家長的威嚴，極爲重視家風，嚴格要求孩子的品行。但他們內心十分明白，戰爭是非常時期，物資奇缺。男性家長維護面子不願意做出不體面的行爲，但對長期處在飢餓又是發育階段的孩子，爲了果腹而乞討或偷點食物，也只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畢竟這是一個連成人都無法溫飽的特殊時期。⁸¹

79 張鈞主編，《述林 1，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1931-1945 中國往事》，頁 8-9。

80 張鈞主編，《述林 1，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1931-1945 中國往事》，頁 10-11。

81 即使是成人也窮於應付戰爭帶來饑寒交迫的困境。參閱游鑑明，〈處處無家處處家：中國知識女性的烽火歲月〉，《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3（2014 年 6 月），頁 1-63。

孩子對於家庭的經濟援助，有時還能在關鍵時刻發揮作用。豐一吟的父親豐子愷，作為著名畫家兼作家，平日潛心於藝術事業，對家中開支與人情往來，概不過問，全靠妻子持家過日。豐子愷坦承自己毫無理財觀念，左手賣畫，寫稿賺錢，右手卻經常仗義疏財，接濟親友，花錢如流水。抗戰烽火四起，逃難在即，豐家寄放在銀行的存票一時半刻無法兌換，家中僅剩數十元現款。最後是豐子愷的六個孩子把每年存下來的生日紅包湊成四百元路費，解了燃眉之急。⁸²

孩子們不像成人顧忌外界眼光，再加上渴望得到父母認同，他們從事一般人眼中不體面的工作時，並不十分在意。豐一吟 10 歲的時候，豐家準備從貴州都勻遷到遵義。大人們打算在門口擺攤，賣掉家用品換取旅費。豐家擺攤的事照例由豐子愷的妻子打理，她選中了女兒豐一吟當助手。豐一吟在當地生活期間學會了貴州話，可以應付日常簡單對話。當她看到有人上門詢問價錢時，連忙高興地打招呼，轉身要問母親時，卻找不著她。原來母親因為難為情，事先躲了起來。幸好母親已經事先叮囑過售價，豐一吟對顧客的提問對答如流，毫不膽怯，有模有樣地做起生意。⁸³

反觀兒童視角下的成人角色，有時為了應付戰爭生活顯得力不從心，左支右絀。瓊瑤的父親與母親出身讀書世家，兩人皆是新時代的知識份子，也是學校教師。父親陳致平原本取得廣州大學聘用，逃難到貴州榕江時，卻因為學校發不出薪水而被迫另謀出路。這位大學教授決定暫且放下面子當起叫賣小販。陳家人分成兩組，瓊瑤和父親專賣紅薯，母親

82 豐一吟口述，周崢嶸撰稿，《豐一吟口述歷史》，頁 30。

83 豐一吟口述，周崢嶸撰稿，《豐一吟口述歷史》，頁 75。

與弟弟負責賣糍粑。瓊瑤父母如此安排的理由是貴州當地人最常吃的是食物是糍粑，紅薯則是因為價廉且可以果腹。沒想到榕江當時因為湧入大批難民，四處都有人叫賣紅薯，生意競爭激烈。瓊瑤形容自己的父親，平時在講臺上滔滔不絕，在菜市場上卻呆若木雞，完全不懂得招攬客人。等到其他小販貨都賣得差不多，終於才有人上門買父親的紅薯。陳父高興地從鍋裡撈起滾燙的紅薯，卻因為從沒做過這些事，一面撈一面掉。好不容易撈起來，秤了老半天，卻不知道該怎樣秤出半斤，尷尬地轉過頭問瓊瑤該怎樣做。一旁的小販看不下去，主動上前幫忙。正當陳父從秤上拿起紅薯時，又是一失手，全掉在地上。眼看顧客快要失去耐性，乾脆讓對方想拿多少就自己拿。幾天下來，瓊瑤一家人三餐不是紅薯就是糍粑。⁸⁴

加入難民潮的瓊瑤一家人，過著與難民一樣的生活：一根扁擔肩挑起鍋碗瓢盆，隨時可以在路邊埋鍋造飯，風餐露宿的結果是貧病交迫。對6歲的瓊瑤來說，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到處撿拾木柴，木柴對難民來說是搶手貨。她必須和眾多的孩子們，甚至是大人競爭撿木柴。瓊瑤回憶這對她而言是一件艱難又痛苦的事，因為到手的木柴有可能再被其他男孩搶去。但是她明白自己的職責所在，如果沒有木柴就不能燒飯，全家人就會餓肚子，她只能拼命地完成任務。⁸⁵

無論是王鼎鈞乞討後，急忙在父母面前獻上自己的「所得」；或是潘際鑾盜雞偷果為家人補充食物，輟學到工廠工作貼補家用；或是豐一吟與兄姐湊錢救急，幫忙大人擺攤做

84 瓊瑤，《我的故事》，頁96-98。

85 瓊瑤，《我的故事》，頁100-101。

生意；還有瓊瑤爲了讓家人吃上飯，小心翼翼地守住木柴不讓其他孩子奪去，全都流露出孩子們渴望得到父母肯定的心情。傳主們從兒童角度描述這些經歷時，期許自己可以和成人一樣貢獻家庭，並且從中獲得成就感。戰爭造成中國家庭不同程度的損害，生活在困頓年代的兒童，看似扮演著極不起眼的角色，藉由重述這些過往兒時經歷，無疑是對自己走過的一段戰爭童年經歷給予肯定，珍視自己曾與家人共患難的歷史。

值得注意的是，從本文所探討的案例來看，傳主們在描述童年所從事的家務活動時，並沒有刻意強調性別上的分工。但是這並不能否認兒童的家務角色存在性別分工的情況。根據人類學者研究，對比文獻資料與觀察傳統部落生活型態紀錄之後，主張前現代社會的兒童經由參與雜務工作建立起自己的身份認同；其中，男孩與女孩的性別角色由不同雜務所界定。通常女孩所做的家務與母親所做的家務接近，而男孩多半從事放牧、狩獵、巡邏遙遠田地，活動範圍較廣，而且男孩免於做家務的自由度相對比女孩高。⁸⁶ 不過，研究者也指出，如果家中沒有適當年齡的女孩可以操持家務，男孩也要擔負起這些責任。⁸⁷ 在本文所討論的案例中，男孩與女孩的雜務並無明顯的區隔。一方面是傳主在家中的排行與年齡，在弟妹年紀還小的情況下，長子和長女同樣需要協助母親料理家務。另一方面，傳主們的父母主要出身知識階層，

86 大衛·蘭西(David F. Lancy)認為，在外部觀察者眼中，男孩的工作，通常看起來比較像是遊戲，至於女孩的工作，通常看起就是工作。大衛·蘭西(David F. Lancy)著，陳信宏譯，《童年人類學》，頁 367-368。

87 大衛·蘭西(David F. Lancy)著，陳信宏譯，《童年人類學》，頁 372-373。

知識份子更看重的是女孩受教育的權利，而非作為家庭的儲備勞動力，這也使得本文傳主們的戰爭童年經驗反映一定程度的知識階層色彩。

（二）成為情感寄託：家庭（家族）希望的化身

兒童對家庭的貢獻除了物質層面的勞動，也在精神層面上支持著成人。通過底下楊以琳與王鼎鈞的例子，我們可以觀察兒童如何成為父母戰時重要的精神寄託，甚至背負家族延續的使命。

前述楊以琳一家人在徐州淪陷之際，躲進美籍人士創辦的基督教會學校避難，她後來又獨自在學校住了近三個月才回到家中。一到家門口，她立刻被一股撲鼻的腐朽酸臭味道，衝得作嘔。這才驚訝地發現往昔花木扶疏、栽滿奇花異樹的庭園，變得殘破不堪，每間屋子的牆壁都遭到日本騎兵開了洞。家中原本經營的木板與蔬果生意一落千丈，楊父被迫改以賣糞維生。⁸⁸ 楊家突逢變故，促使家中孩子們加入生產行列。楊以琳回憶，淪陷區的人民在勝利前半年，沒有報紙可看、沒有收音機可聽，老百姓不知道前線的消息。另一方面，日用品嚴重短缺，購買物資必須大排長龍。為了替家裡多賺一些錢，楊母要求她在暑假期間去做黃牛。楊以琳因為不喜歡這種賺錢方式，只好瞞著母親，以到校補習為藉口躲避當黃牛。⁸⁹

日本人在徐州帶來浩劫，不只生靈塗炭，還破壞當地人的墳墓，造成精神折辱。日本人在徐州城門設立哨站，嚴格

88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48、56。

89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139。

檢查進出，規定出入的行人必須要向日本軍人彎腰鞠躬。楊家人因為不想受氣，又想省去麻煩，拖了三年不出城掃墓。後來大人們乾脆將掃墓一事交給小孩。有一年，楊以琳和弟弟發現墓地的石碑與牌坊全都不見了，詢問守墳的老者，得知原來是當地游擊隊得到中央軍的軍火接濟，導致日軍不敢下鄉。日軍害怕游擊隊進城，於是把墓地的石碑、石碑及石材全都搬去做建材，將原來土造的城門改成石牆。⁹⁰

楊以琳和弟弟回家後將這一切告訴父親，楊父聽完後什麼也沒說。到了晚上卻獨喝悶酒，自言自語，一邊咒罵一邊痛哭，沒人勸得住。當大家以為父親罵累而睡去，姐弟兩人正要悄悄溜走，卻被父親叫住。楊父要求兒子發誓，將來一定要負起重新整頓祖墳的責任。楊以琳的弟弟立刻作誓說：「等我長大，我一定要做一番大事業。我一定要光宗耀祖，我一定要重立那些石碑！」楊父聽完後向兒子下跪道謝，楊母則在一旁急得嘶喊，最後全家人哭成一團。⁹¹ 兵荒馬亂的年代如何延續家族的重擔，原是男性家長的責任，楊父卻在醉後將家族的前途託付給孩子，突顯了成人對現實世界的無能為力。雖然光宗耀祖此刻對兒童來說，或許過於遙遠而無法完全理解，但孩子確實對成人所承受的悲憤與痛苦能夠感同身受。

比起家族榮譽，烽火下的家庭更重要的渡過是眼下的生存難關，不少兒童早早地背負起成人的責任。前述王鼎鈞急忙向父親獻上乞討所得時，他的父親卻要求他先找來弟妹，等到三人齊聚後，下令先讓弟妹享用。待三個孩子大啖特啖

90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 152。

91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 90-93。

時，王父自己卻不吃，並且諄諄告誡王鼎鈞：「也許有一天，你得帶著弟弟妹妹討飯。那時，你要記住，若是討到好的東西吃，一定要讓他倆先吃。」⁹² 王鼎鈞的父親似乎忘了，此時的王鼎鈞不過也是個 11、12 歲的孩子。

積極灌輸長子「長兄爲父」的思維，或許是王父在個人生命輕賤如螻蟻般的亂世，支持他相信家族香火能夠被保存的重要信念。有一次，王家逃到江蘇宿遷的教會，王父特地將王鼎鈞叫到身邊，強調說：「我們在逃難，日本鬼子在追我們。」接著又講述鄧攸逃難的故事，然後問他：「如果，我是說如果，沒有爸爸，沒有媽媽，只有你，你帶著兩個孩子逃難，一個是弟弟，一個是你自己的兒子，你只能抱一個孩子逃，那時，你抱哪一個？」⁹³ 王鼎鈞被父親的話弄得糊裡糊塗。他心想，自己怎麼會有兒子？他如果有了兒子，弟弟一定長大成人了，怎麼還需要被他抱著走路呢？他想不通這些矛盾，遲遲無法給出答案。焦急的父親以爲他的沉默是不願意對弟弟負責任，氣極敗壞地打了他一耳光。不巧，教會執事走進來，看到這一幕大吃一驚，生氣地問：「你們到底是不是基督徒？怎麼打孩子呢？」假如當時執事認定他們假冒基督徒，完全可以拒絕收留他們。父親只好收手，不再追究他的沉默。⁹⁴

王鼎鈞的父親以晉朝八王之亂時代「鄧攸棄兒保侄」的故事告誡他，強調捨己性命替手足留後的大義。王父的行爲看似過分無理，但與其苛責他要求長子犧牲生命保全弟妹，

92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 130-131。

93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 143。

94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 143。

不如說，這位父親急切地希望長子可以在關鍵時刻承擔起他的角色，替他照顧好兒女，無形中將自己作父親的焦慮與責任轉移到長子身上。當一位父親將年紀幼小的兒女託付給年齡較大的孩子，表現出無力感的同時，也動搖了成人在兒童心目中的權威地位，尤其是男性知識份子一家之主、家父長的角色。

但另一方面，我們從傳主們的父親身上，看到父親對待男孩和女孩的態度的其實有所區別。承前所述，本文討論的傳主父母們出身知識階層，在教育資源上並沒有刻意分別男女，厚此薄彼。但是從楊以琳的父親對弟弟光宗耀祖的盼望，以及王鼎鈞的父親對他養活弟妹的期待，說明在家族延續的議題上，男孩遠比女孩更為重要。這是抗戰兒童重要的性別差異經驗之一。

綜上所述，傳主們所描述的戰爭經歷與家庭生活，說明兒童不只是被動的受照顧者。面對戰爭，他們與成人同樣努力求生存，在自己能力所及的範圍內，全心全意對家庭付出勞動與情感。兒童不論從事家務活動，或是照顧手足，都盡力扮演好父母可以信賴的幫手。同時，兒童也是成人寄託情感的對象，他們化身為家族的希望，和成人共同承擔戰爭帶來的各種生活壓力，被期望在關鍵時刻支撐起家族命運。兒童面對戰爭所展現的承受力量，並不亞於他們的成人父母。

四、戰時兒童的學習經驗與愛國教育

學校是現代社會學齡兒童社會化過程的重要場域。著名兒童史學者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認為現代學校

制度的出現，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將兒童與成人社會分隔開來。⁹⁵ 民國時期的高、中及小學教育，可以視作是國家特別為學齡兒童與青少年設置的學習場域。小學教育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啓蒙知識，還有栽培民族幼苗的重任。⁹⁶ 換言之，學校是培養愛國主義的重要基地。1931年九一八事變之後，國民政府教育部積極對各級學校陸續頒布愛國教育實施課程。⁹⁷ 根據民族主義理論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提出的第三種民族主義——官方民族主義，其特徵便是國

-
- 95 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著，沈堅，朱曉罕譯，《兒童的世紀：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頁205。阿利埃斯主張中世紀的歐洲社會，並無現代人所認知的「童年」觀念，這是因為當時人沒有刻意區分出兒童與成人之間的差別。
- 96 1921年出生的史家何兆武，在他的口述訪問《上學記》裡回憶，北洋政府與國民政府不同的一點，在於國民黨政府主動對學校教育採取意識形態的灌輸，黨國教育政策其中一項重點是國家觀念。他讀小學期間，學校在北伐以後開始出現政治學習課程，要求學生背誦三民主義，了解三民主義是救國主義。參閱何兆武口述，文靖執筆，《上學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頁6-11。
- 97 1931年之後，受日本發動九一八事變刺激，愛國教育在初中以下學校教育中不斷被加強。1931-1937年間，國民政府教育部對各級學校陸續頒布愛國教育實施課程。例如1931年10月，國民政府教育部令飭各級學校，每週加臨時課專講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1931年11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童子義勇軍組織及訓練辦法》，此乃依據國民黨中央執委會制定的《學生義勇軍教育綱要》，其內容規定：初中以下組織童子義勇軍，實施軍事訓練，以雪恥救國為目標；在課程上，注重本國歷史地理，特別注重外交史及國防地理，文學藝術課程必須發揚民族精神。1933年2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小學公民訓練標準》，目標之一即養成兒童愛國愛群之思想。1936年7月，國民政府教育部公布《修正小學課程標準》，總目標之一即是培養兒童民族意識。上述資料請參閱：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8），頁233、264、350。

家利用教育作為手段，從上而下推行對民族共同體的認同。⁹⁸關於抗戰時期的兒童愛國教育，目前研究主要從國家教育政策及教育工作者的角度出發，著重成人對兒童教育的建構。⁹⁹本文則是以兒童的主體經驗作為另一項觀察側面，討論兒童對於愛國教育的回應。本文的傳主們回溯期童年抗戰經驗時，都不約而同提到了學校教育如何啓迪愛國思想，有助於我們理解戰時兒童接受國家與民族觀念的過程。

另一方面，戰亂使得各級學校難以維持正常運作。學校反覆地關閉或輾轉向後方遷移。不少孩子因為跟著家庭逃難，無法正常上學。許多兒童是在不停更換學校的過程中，斷斷續續地完成學業。他們在不同地點，進入不同學校短暫地學習，產生獨特的「游學」現象。此外，有些淪陷區的家長不願意孩子就讀敵人控制的學校，私下另聘老師授課。這種採取傳統私塾形態的彈性方式，接濟了戰時被中斷的新式學制，成為戰時兒童特殊的學習現象。

（一）戰爭教育與愛國主義

相較於家庭作為兒童生活的私領域，學校則可以視為兒童活動的公領域。在學校場域中，我們更容易觀察到國族意識是如何被教導融入兒童的心靈。有著抗戰童年經歷的傳主

98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頁 87-88。

99 徐蘭君研究抗戰時期兒童的國難教育，指出國家利用教科書、課外讀本及兒童刊物，對兒童進行抗戰宣傳，改造兒童的日常生活空間，致使戰時兒童生活趨向軍事化。參閱徐蘭君，《兒童與戰爭：國族、教育及大眾文化》，頁 28-57。

們，經常在回憶中提及學校老師如何利用自身言行與授課機會，激發學生的愛國精神。學校除了安排學生學習各類戰爭常識，也配合地方政府動員學生進行後方支援活動。例如向大眾募集物資、宣傳抗戰的必要性，以及慰問傷兵等等。這些都對兒童的抗日精神起到一定的鼓舞作用。

底下藉由分析抗戰前後王鼎鈞就讀學校的學習氛圍變化，以及他所接受的戰爭教育，闡述 1930 年代的學校教育對兒童灌輸民族主義的過程。最初，王鼎鈞從家塾轉讀小學是參加插班入學考試，由蘭陵小學校長主持面試。校長出題目問他「北望滿州」是什麼意思？當時民眾抗日情緒高漲，小學生天天高唱吳佩孚的《滿江紅》，歌曲開頭第一句便是「北望滿州」。王鼎鈞雖然也會唱這首歌，但是從未看過歌詞，也不解其意，只能依照自己的領會來回答：「很悲痛的看一看東三省。」校長很驚訝地看了他一眼，告訴他沒答對，但是卻被錄取。他後來才知道，校長認為他錯得很有道理。¹⁰⁰

王鼎鈞回憶，抗戰爆發前夕，學校的歷史老師在課堂上痛述百年來的國恥紀錄，班上同學聽完後覺得羞憤而伏案痛哭。儘管如此，大家日子依舊過得昏昏沉沉。有一次，國文老師發給每人一顆糖，因為當天的課文正好提到：「臺灣糖，甜津津，甜在嘴裡痛在心，甲午一戰清軍敗，從此臺灣歸日本！」大家開心地吃糖，卻忽略老師的用意是為喚醒學生的愛國心。隔天老師抽背課文時，學生們不當一回事，一向溫和的老師為此罕見地發了一頓脾氣。¹⁰¹

不久，中國正式對日宣戰，全校師生都熱血沸騰了起來。

100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 47-48。

101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 64-65。

王鼎鈞還記得校長當年緊握拳頭，臉紅脖子粗地對著所有人吶喊：「小日本兒貪得無厭，把臺灣拿去了，還嫌不夠，又拿東北；東北拿去了，還嫌不夠，又來拿華北。小日本兒他是要亡咱們的國滅咱們的種！這一回咱們一定跟他拚跟他幹！」受到鼓舞的學生們紛紛在黑色磚牆上，以粉筆寫下「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一時間，全鎮全校，一片沸騰，到處都有人唱著「把我們的血肉築起我們新的長城」，唸著「地無分南北，年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皆應抱犧牲一切之決心。」¹⁰²

在學校老師的主持下，學生們被分派到鄉下募集銅鐵，以便供給兵工廠製造子彈。王鼎鈞被分配到北郊的農村，這是他第一次真正接觸到農民。這段時間，學生們天天出動，縣政府還派人員到學校視察，誇獎學生們新編的抗日宣傳壁報。另一方面，老師們也放下手邊的教學，投入抗戰活動。學校老師是鎮裡少有的知識份子，受到鎮民的尊重。老師們爲了喚起民眾抗日意識，自編自導日軍侵略中國造成百姓流離失所的故事；爲了鄭重其事，甚至主動邀請演戲的師傅指導身段，再吊上個把月的嗓子。老師們的演出轟動一時，感動了許多鄉親，募到不少錢。¹⁰³ 這些學校安排的活動說明了學生們是在教師的引導下，懷抱著抗日的心情從學校走向群眾。老師的愛國言行，學生們看在眼裡，也參與其中。

慰問傷兵是小學生經常被動員參加的活動之一。1937年冬天，戰局自北向南延燒，山東的韓復榘棄守。1938年初，日軍攻進臨沂後，傷兵源源南下準備轉往臺兒莊，正好經過

102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66。

103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69-70。

王鼎鈞的故鄉蘭陵。當地鎮公所接到通知，便立刻動員民眾與學生。民眾負責燒開水、煮稀飯，學生則是人人一把蒲扇，用來替那些躺在牛車上或擔架上的傷兵趕蒼蠅。¹⁰⁴ 另一位傳主潘際鑾也有類似的經歷。1937-1938年間，潘際鑾在九江讀小學時，戰爭的氣氛非常濃厚，學校老師帶領學生取水前去慰問傷兵。他親眼見到缺胳膊、缺腿的傷兵，就這麼躺在大馬路的兩邊。最讓他驚訝的是，這些傷兵既沒有闖進民眾家門，也沒有擾民。¹⁰⁵

值得注意的是，戰爭除了喚起兒童同仇敵愾的感受之外，還伴隨著興奮與新奇的情緒。王鼎鈞回憶抗戰爆發後，聽到的消息雖然都是傷亡與撤退，可是大家非但不沮喪，反而興奮得睡不著覺。從七七事變到日本轟炸蘭陵的半年時間，學校不上課，學生們突然得到走出教室的機會，參與各種抗戰活動。戰爭也給孩子們帶來許多「第一次」的新鮮體驗。例如第一次看到收音機，聽到無線電廣播；第一次「做報紙」，挨家挨戶地發送；第一次演戲，在群眾面前表演「放下你的鞭子」；第一次慰問傷兵；第一次經歷空襲等等。¹⁰⁶ 而校外的世界，也因為國家正式對日宣戰，群眾的心情全都亢奮了起來，猶如打破了悶葫蘆，陰霾四散。¹⁰⁷ 當時蘭陵鎮上的小酒館裡，擠滿了無心工作的人們，整天高談戰局。¹⁰⁸ 王鼎鈞記得，隨著戰爭持續不斷，老師們紛紛離校加入了游

104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67。

105 張鈞主編，《述林 1，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1931-1945 中國往事》，頁3-4。

106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69。

107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69。

108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91。

擊隊，而同學們也漸漸地不來上課，最後，每個人的心都變野了。¹⁰⁹ 彷彿除了抗戰之外，人生沒有其他更重要的目標。當抗戰這件事的重要性取代上課學習時，學生們幾乎都興奮了起來。

儘管學校與老師利用集體教育的方式，引導學生認識自己做為國家一份子的重要性，但是兒童在參與過程中，被激發的不只是愛國情操，還有對戰爭的「興奮感」與「新鮮感」。抗戰打破了平淡無奇的生活，學生們從日復一日枯燥乏味的課堂學習中被解放出來，獲得新鮮的體驗，並且為此感到興奮。這些無法被安置在國族框架內的經驗描述，更貼近兒童對戰爭最初的感受，也是他們迅速加入抗戰活動，並且樂於接受抗日民族觀念的動力之一。

（二）游學現象與私塾再興

想方設法讓孩子在戰時持續接受教育，是來自知識階層父母們的堅持。本文的傳主們跟著父母逃難離鄉時，他們的學習經常是在不穩定的狀態下進行。例如，陳彥增的小學是從三年級開始讀起，三年級下學期開學不久，戰事告急，學校便宣布停課。他後來跳過四、五年級，直接就讀小學畢業班。他回憶自己進入學校讀書，從來沒有在同一所學校念完一個學期。他待過最短的一所學校只有一個禮拜。像他們這樣跟著部隊跑的孩子，都有同樣的「游學」經驗。¹¹⁰ 另一位傳主潘際鑾，小學總共花了四年時間，但是真正讀到書只有三年；中學雖然花了六年時間，念了六所中學，實際上讀不

109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 70-71。

110 陳彥增，《難童日記》，頁 48、72、111。

到四年。因為他一邊上學，一邊打工兼做生意，還一路和家人逃往後方，克服萬難完成學業。¹¹¹

在戰火中斷斷續續完成學業的兒童的還有崔玖、豐一吟及王鼎鈞。崔玖 1926 年出生於山東煙臺，1936 年隨家人搬到上海法國租界，進入私立正始西區小學讀五年級。當時學校裡的老師已經開始教導學生如何在空襲時擦著牆壁走路，躲避周圍的流彈，或是在炸彈來襲時立刻躺下躲避危險。¹¹²由於父親崔唯吾被日本列入暗殺名單，決定在 1937 年 12 月離開上海。隨後崔玖和弟弟跟著母親，在 1938 年 3 月先到香港，再搭船到廣州，接著轉乘火車到達武漢，最後抵達重慶與父親團聚。崔玖沿途躲過日本飛機的轟炸，輾轉讀了八個學校才把中學讀完。¹¹³豐一吟則是小學五年級還沒讀完就開始跟著父母逃難，逃難期間就由父親豐子愷親自授課。¹¹⁴

除了游學現象，有些家長替孩子選擇私塾形式的私人講學，目的是避免讓孩子就讀敵人辦的學校，以間接的方式教導孩子維護民族氣節。從 1930 年代前後開始，新式小學已逐漸淘汰私人學塾，但是戰爭發生後，私塾又紛紛冒出頭來。¹¹⁵例如王鼎鈞小學高年級尚未讀完，學校便宣布停辦，王父將他送入私塾跟著老先生讀書，後來又聘請鄉里著名的舊學先

111 張鈞主編，《述林 1，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1931-1945 中國往事》，頁 373-374。

112 崔玖口述，林少雯、龔善美執筆，《崔玖跨世紀》（臺北：心靈工坊文化，2000），頁 11。

113 崔玖口述，林少雯、龔善美執筆，《崔玖跨世紀》，頁 59-62。

114 豐一吟口述，周崢嶸撰稿，《豐一吟口述歷史》，頁 78-79。

115 根據王鼎鈞回憶，他的家鄉從 1930 年代開始，官立小學逐步淘汰私人學塾，戰爭發生後，小學停辦，私塾又紛紛成立起來。王鼎鈞，《昨天的雲》，頁 227。

生單獨指導，就是不願意讓他進入老家的淪陷區讀中學。¹¹⁶另一位傳主成湯，家鄉在江蘇興化，抗戰時期淪為汪精衛的偽政府所控制。當地偽政府在淪陷區每個縣裡設立中小學，較大的縣甚至設置大學。但是成湯的父親也不願讓自己的孩子上「偽學校」接受「偽教育」，而是讓他在自家開辦的「私塾」讀書，而私塾的老師就是他的外公。成湯家的私塾收了約十名學生，全都是興化的權貴子弟，上課地點是當地一位富人所提供的書房。學習的內容有《三字經》、《千字文》、四書五經、《資治通鑑》。成湯的外公對課業要求十分嚴格，深受到當地家長敬重。¹¹⁷

成湯進入初中學齡階段後，他的父親特地找來一群興化仕紳幫忙，開辦了一所與中學相當的私塾。成父也是其中一員，負責教授文選。這群興化仕紳水準相當高，不少畢業自北大、清華、燕京、復旦及交大。這些人不願意出任偽政府職位，不想替日本人做事，整天避居家中，以打牌、吃喝表明對世事無感，但其實他們非常關心下一代的教育。¹¹⁸ 這所私塾不使用偽組織的教材，而是由老師寫信聯絡重慶後方的友人，請他們寄來內地的書籍。但因為物資短缺，洛陽紙貴，書籍全是以草紙印成。同時，為了怕被日本人發現，這些書都事先拆開過，每次從後方寄個幾頁過來。令人感動的是，郵政人員為了把教材安全送達他們手中，也會主動幫忙躲避審查。老師們收到書後，再將書本用蠟紙刻成鋼板印出來給

116 王鼎鈞，《昨天的雲》，頁 227-253。

117 成湯口述，成英姝編輯整理，《我曾是流亡學生》，頁 46-50。

118 成湯口述，成英姝編輯整理，《我曾是流亡學生》，頁 50。

學生做課本。¹¹⁹ 而淪陷區的警察局長、縣長以及軍隊師長，都知道成湯父親他們辦的學校，非但沒阻止，還將自己的孩子送過去讀書。¹²⁰

這些冒著風險、秉持愛國心來教育兒童的老師，特別是在敵人控制下的淪陷區，對學生的愛國意識起了相當大的鼓舞作用。成湯認為正是有這群一流人才做為老師，才使他們在淪陷區受到很好的教育。¹²¹ 而即使是在敵人掌控下的學校裡，也有不少中國老師是以隱忍、間接的方式，偷偷地傳遞愛國思想，守護民族幼苗。¹²² 例如楊以琳，她的家鄉徐州是通往後方的要道。楊以琳就讀市立中學時，學校裡的老師有來自北平師範大學、北大、清華、燕京等學校的高材生，甚至還有大學教授，他們都是計畫走向後方投身抗日。有些老師教一學期，有的教一、兩年，一有機會就走。這些年輕老師對於當地青年學子的愛國風氣產生相當大的影響。¹²³

上述這些戰爭兒童的學習經驗，提供我們了解當時的父母與兒童如何克服顛沛流離的生活，堅持完成教育的歷程。另一方面，我們也從學校為學生安排的各種戰爭課程與動員

119 成湯口述，成英姝編輯整理，《我曾是流亡學生》，頁46-47。

120 成湯口述，成英姝編輯整理，《我曾是流亡學生》，頁51。

121 成湯口述，成英姝編輯整理，《我曾是流亡學生》，頁47、51。

122 東北淪陷時期女作家張杏娟(1923-2013)，時任東北地區小學老師，提到自己作為小學老師，雖然力量微薄，但能力總是比學生們強。她有時候會拿些食物給孩子，幫助他們改善生活；而在教育方面，雖然不能大膽地指出日本人所做的壞事，不敢高聲地說日本人的惡行，但總是想盡辦法，藉機會默默地滲透一點訊息，孩子們慢慢地也都能明白，自己為何遭受日本人壓迫，過著忍飢受餓的生活。參閱張杏娟口述，柯小菁整理，〈女性之眼，時代之影——東北老作家張杏娟口述〉，《文訊》期320（2012年6月），頁89-93。

123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112-113、120。

活動，以及師生互動的情景，觀察到眾多教育工作者懷抱救國熱忱，無畏險阻，將國家觀念以及重要的知識傳遞給下一代。

五、創造兒童文化：戰爭遊戲

家庭與學校是近代社會兒童的主要生活領域。若將家庭與學校概略地劃分為兒童活動的私領域與公領域，無論在公或私領域，兒童看似都是在成人的安排下學習社會的主流文化價值。以徐蘭君與 Samuel Hideo Yamashita 的研究為例，兩人分別探討中日戰爭期間兩國的兒童教育，焦點都集中在說明國家如何通過教育手段，以教科書和遊戲為工具，培養兒童的民族與公民意識。¹²⁴ 不過，如果以「兒童的主體性」作為觀察視角，兒童們是不是有能力在成人安排之外，獨自創造出屬於兒童的文化？而這樣的兒童文化與成人世界有著什麼樣的關聯與意義？底下藉由兒童創造的戰爭遊戲來說明，孩子們如何模仿成人社會、理解戰爭，卻又能利用嬉戲轉化戰爭引發的現實焦慮，達到娛樂與抒壓的效果。

遊戲是兒童日常生活的重要活動之一。童年社會學家威廉·科薩羅(William A. Corsaro)指出，兒童主動從成人世界汲取、雜揉各種信息，滿足自身的需求，創造出獨特的同伴文化，同時又對成人文化有所貢獻。¹²⁵ 底下楊以琳與陳彥增

124 徐蘭君指出戰時教育工作者，除了使用教科書，也有意識地將民族主義的教育理念設計在兒童的國防遊戲與抗戰玩具，灌輸給兒童。參閱徐蘭君，《兒童與戰爭：國族、教育及大眾文化》，頁 28-57。Samuel Hideo Yamashita,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940-1945*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15), pp.61-89.

125 威廉·科薩羅(William Corsaro)指出，兒童在遊戲過程中，擁有自主性，

對戰時童年遊戲的回憶，提供我們觀察兒童積極應對戰爭的另一個面向：他們一方面模仿成人社會的思維與運作方式；另一方面主動吸收並轉化來自成人世界訊息，通過遊戲展現其創意與能動性。

「口令？」「老百姓！」「幹啥？」「請醫生！」「請醫生幹嘛？」「給俺娘看病！」楊以琳回憶，這是她小時候和弟弟經常玩的遊戲。他們總是能找來兩把椅子或是兩張長凳子當作城門，她的弟弟喜歡扮演日本衛兵，擺出威風凜凜的姿態，站在城門口巡視；而楊以琳則是飾演卑微順從的老百姓，一副委屈的模樣從牆角默默地走向城門。有時候弟弟不按常理出牌，追問她「什麼叫醫生！」她則靈機應對「給人看病的嘛！」如果弟弟神氣地說「給人看病的是郎中，什麼一生二生的。回去，回去！巴格牙鹿！」這時，遊戲就得從頭再來一遍：「口令？」「老百姓！」「到哪兒去？」「進城請郎中！」「請郎中幹嘛？」「給俺娘看病！」「你娘生的什麼病？」「她老人家喉嚨疼！」「過去！」弟弟作勢打開城門之際，還會模仿守門的日本兵，再加上一句「混賬老百姓！」¹²⁶

這場「老百姓」的兒童遊戲，完全再現淪陷區百姓在敵人統治下仰人鼻息的生活。透過戰爭遊戲，一方面，孩子以一種詼諧有趣的方式理解戰爭，讓人感受到兒童的天真爛漫與好玩樂的心情，軟化了日常生活所面對的嚴峻考驗。但另

也是成人文化的再生產者。他們所創造的兒童文化，同時貢獻於成人文化與兒童文化。參見威廉·A. 科薩羅(William A. Corsaro)著，張藍子譯，《童年社會學(第四版)》，頁62。

126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80-81。

一方面，卻又折射出現實世界的殘酷。張揚跋扈的日本兵與委屈求全的中國百姓，活脫是現實生活的縮影。「混賬老百姓」成爲慣用語，正是逆來順受的中國百姓長期處在社會權力邊緣位置的寫照；而取自日文諧音的「巴格牙鹿」（ばかやろう），則是淪陷區裡最常聽見日本兵辱罵人「笨蛋」的口頭禪，就連孩童都耳熟能詳。

遊戲離不開日常生活，甚至成爲歷史傳承的一部分。楊以琳的故鄉徐州是兵家必爭之地。她回憶從小就接觸不少戰爭故事，除了史書與戲曲記載，還有些是來自母親口述，取材自故鄉人世代口耳相傳的軼聞。這些都成了當地孩子們遊戲的材料。有趣的是，她從小和弟弟及鄰居同伴玩的戰爭遊戲，經過十幾年後，家裡最小的妹妹出生，小妹的童年仍舊是玩「戰爭」、玩「逃離」、玩「日本飛機丟炸彈」，以及「母親生病」等遊戲。¹²⁷ 孩子們創造的遊戲文化，正以一種兒童獨有的方式將歷史經驗保存下來，在日常生活中不斷再現與展演。

遊戲是兒童的天性，他們可以輕易就地取材或隨機應變，利用各種機會進行玩耍。底下是陳彥增回憶小學生活，班上同學如何把握演習的機會，把演習當作遊戲來自娛娛人。1943年插班讀小學的陳彥增，某天上體育課時，老師要求練習躲警報。學生們紛紛不耐煩地發出「啊」的聲音，說道「又是老套」，七嘴八舌地鼓譟著。可是當老師吹起哨子時，全都配合了起來。當老師吹響長長的一聲哨子，示意飛機快要來了，學生們便向四面八方跑去。有人跑到田埂上，

127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頁 80-81。

有人鑽進草叢裡，有些人懶得跑，便蹲在學校牆角下，遭到老師驅趕。陳彥增選擇躲在一棵大樹的後方，另外有兩位同學爬到樹上。老師看著所有人藏好後，再吹響幾陣短聲，暗示飛機已經在頭頂盤旋，同時手裡撿起泥塊扔向天空，掉下的泥塊代表炸彈開花。此時，所有人抱住自己的腦袋，緊緊地趴在地上。過一會兒後，老師再度吹起哨子，表示演習結束。¹²⁸

演習途中爬上樹的兩位小朋友，事後遭到老師的追究。老師責問他們為什麼要爬上樹去，學生坦率地回答：「這是玩假的嘛！要是真的，我就不了！」老師朝他屁股打了一下，告誡他說：「要是真的，你早就沒命了」。另一個學生則是頑皮地說：「我是想上去看看有沒有向日本飛機照小鏡子的漢奸。」老師也朝他屁股敲了一下說：「你們都有理。」¹²⁹這段敘述中，老師並沒有以嚴厲的態度來指責學生，甚至寬容了兒童們以遊戲來看待演習的心態。對兒童而言，區分現實轟炸與帶著遊戲的心情演習，並不是問題；能夠擷取成人世界給予的戰爭訊息，並且融入日常生活的活動，進而發揮創造性的遊戲，這才是兒童特有的文化表現。比起成人，兒童更容易在戰爭日常生活中，輕鬆發掘苦中作樂的趣味。

承上所述，陳彥增這段演習經驗，完全是從兒童的視角出發。他在《難童日記》一書裡，刻意以兒童的口吻敘述，突出兒童與成人不同的觀察視角。陳彥增主動向孫子敘述他童年抗戰的故事，也是藉機傳達個人對抗戰的歷史觀點。他特意在書中津津樂道一段中國小孩「打贏日本人」的故事。1943年某個大雪的冬天，陳彥增和玩伴小泥鰍、鐵蛋等人出

128 陳彥增，《難童日記》，頁52-53。

129 陳彥增，《難童日記》，頁52-53。

門玩雪，七、八個中國孩子在胡同裡堆起雪人，玩得不亦樂乎時，忽然來了四個日本孩童。其中一位扛著太陽旗，另外三人肩上扛著短棍棒，裝扮成日本憲兵巡街，模樣十分神氣。小泥鰍見狀說：「日本鬼子碰到憲兵都要敬禮的。」鐵蛋不服氣的回他：「敬禮？門兒都沒有，就憑這幾個小鬼子敢碰碰咱們，非把他一個個的揍趴了不可，別那麼孬好不好！」¹³⁰

接著，這四個日本小孩走到他們面前，噁哩咕嚕說了一些話，陳彥增一群人並未加以理會。扛旗的日本小孩卻突然對著中國孩子堆好的雪人一陣拳打腳踢，其他三位小孩則在一旁鼓譟。這無端破壞雪人的舉動惹惱了鐵蛋。鐵蛋首先出手反擊，扯住扛旗小孩的衣服，再用力往後一甩。其他人見狀後紛紛跟著動手，抓起地上的雪打起雪仗。不一會兒，中國孩子人多勢眾，很快就打倒對方。陳彥增等人沒有就此罷手，故意抓起大把的雪往日本孩子脖子裡灌去，雪一融化便順著褲襠往下流，就像尿褲子一樣，日本孩子們狼狽地逃回家去。中國孩子們自認為贏得光彩，重新堆起雪人之際，日本孩子又從家裡扛出武士刀，嚇得中國孩子們拼命奔逃。幸好一位跟在這群孩子後面的日本婆婆，奪回小孩肩上的長刀，將他們一個個轟了回去。鐵蛋自豪地說，他們這是打了一場「小游擊」。¹³¹

這場中日兒童的打仗遊戲，首先直觀地展示了兒童如何從成人世界理解戰爭。兒童們藉由在遊戲過程中扮演成人角色，區分敵我立場，再次強化了各自的民族認同。Halliday Piel 研究二戰時期的日本兒童遊戲，指出當時日本兒童的戶外遊

130 陳彥增，《難童日記》，頁 26。

131 陳彥增，《難童日記》，頁 26-27。

戲之所以得到成人認可，在於成人認為遊戲具有學習、運動身體，以及傳達對日本認同的功能，有助於兒童與他人進行合作，達到社會化的目的。¹³² 在遊戲過程中，孩子利用角色扮演，完成了對民族立場從理解到認同的過程。

其次，語言是表達自我的工具，也是文化的載體。中國男孩口中的「鬼子」變成「小鬼子」，「打游擊」變成「打了一場小游擊」，以及「揍趴小鬼子們」、「別那麼忸好不好」，完全是模仿男性成人的語氣。他們信手拈來運用在和玩伴的對話上，一方面創造出屬於兒童的戰爭語言，同時承接上更廣大的社會戰爭文化。

再者，遊戲雖然不是真實的世界，但是這場遊戲卻極為深刻地反射出現實世界中日兩國的衝突與戰爭。日本孩子對中國小孩耀武揚威，並非天性如此，而是他們被放置在一個由日本成人所賦予的位置：一個侵略者高高在上的位置。他們從日本成人身上學習到如何對待中國人。中國孩子也是如此，面對來自侵略國家兒童的蠻橫無理，他們決定主動迎頭痛擊，帶著自信，以一種詼諧有趣的方式，扭轉了成人在現實世界的劣勢。

兒童主動利用遊戲過程成功轉化現實劣勢的處境，並非少例。對此，研究黑奴兒童的學者戴維·維金斯(David Wiggins)已有精彩的分析。維金斯認為兒童的娛樂和遊戲，可以幫助兒童處理難以直接面對的焦慮和恐懼，提供一個安

132 Halliday Piel, "Outdoor Play in Wartime Japan," in Sabine Frühstück and Anne Walthall eds., *Child's Play: Multi-Sensory Histories of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pp.160-180.

全的抒壓空間。他研究美國南北戰爭前的南方黑人兒童文化，指出黑人童奴利用與白人兒童一起遊戲的過程中，積極為自己創造展現優勢的機會，達到自我肯定。¹³³ 透過上述傳主們所描繪的兒童戰爭遊戲，我們觀察到兒童主動從日常生活中接收成人世界的訊息，並且將遊戲與戰爭結合，既滿足其玩耍的需求，同時轉化現實世界戰爭的殘酷，發展出兒童獨有的戰爭文化。正是這樣的兒童文化，創造性地傳承了中華民族的戰爭經驗。

結論

這一切都是日本人造成的。日本鬼子要是沒搶占我們的大好河山，我們何至於此？我是南京人，江浙一帶是比較富饒的地方。當時，我不知道別的同学，至少我是被灌輸那個思想：一旦等日本人垮臺、抗戰勝利，我就能回家，好日子就必然到來。¹³⁴

133 戴維·維金斯(David Wiggins)利用美國 1936—1938 年間「聯邦作家項目」(Federal Writer's Project)中所蒐集的大量奴隸敘事、證詞、自傳及日記。研究「1820—1860 年間前南方莊園中奴隸兒童的遊戲娛樂」。發現童奴利用遊戲中的角色扮演，緩解內心的焦慮與恐懼。例如模仿拍賣奴隸而創造出「藏鞭子」遊戲，反映奴隸社區某些殘暴對待成年奴隸的現象，對應關係昭然若揭。另一方面，黑人童奴也與白人兒童一起遊戲，一如日常生活場景，白人孩子往往扮演農場主與監工角色。不過，大多數童奴們經常自豪自己可以在遊戲中勇敢面對白人，尤其在語言遊戲、體能競賽中更勝一籌。這些黑人童奴自覺在德行、身體素質方面，比白人更有優勢。參見威廉·A. 科薩羅(William A. Corsaro)著，張藍子譯，《童年社會學(第四版)》，頁 60-62。

134 張鈞主編，《述林 1，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1931-1945 中國往事》，頁 39。

1930 年出生的金敬邁，在 79 歲高齡接受口述訪問時，談及他的抗戰學童生涯，對過往艱苦的經歷給出上述這段解釋。1942 年秋天，金家因為戰亂長期顛沛流離，金父在貧病交迫下過世，家中頓失經濟支柱，未滿 10 歲的金敬邁被迫上街叫賣油條。他後來打聽到國民政府爲了救助淪陷區的流亡學童，置辦了湖北聯中，便設法偽裝成湖北籍學生混入就讀。他自述在湖北聯中三年，一天三頓飯，雖然吃不飽，但也餓不死；一年一套單衣，三年一套棉衣，穿到後來棉花一點也不剩，可是他始終覺得很滿足。在他所接受的教育觀念中，深信生活的困境全是日本人一手造成的，像他這樣無能爲力的小百姓，只有忍耐。¹³⁵

值得注意的是，金敬邁對這段抗戰經歷的描述，結束在對一個日本人的道歉上。他回憶抗戰勝利後，偶然在路邊玩耍，迎面走來一個日本人，日本人見到他便趕緊躲到一旁讓路。金敬邁的個子小，當日本人向他鞠躬時，他便「乘人之危」，冷不防地給了對方一巴掌。他那年還不到 16 歲，可是他說這「惡念」是從很久以來就存在的念頭。他壓根沒想過戰爭有勝利的一天，只想到「將來有機會，一定要揍一頓日本人」。已近八十高齡的他，最後提起這件事卻反省說：「他沒有惹我，沒有得罪我，我不該扇他耳刮子，這是一種很幼稚的報復心理。不知道這個日本人現在還在不在，他也未必作過惡，向他表示歉意」。¹³⁶ 金敬邁從對日本深惡痛絕，到

135 張鈞主編，《述林 1，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1931-1945 中國往事》，頁 28-39。

136 張鈞主編，《述林 1，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1931-1945 中國往事》，頁 39。

對無辜遭毆的日人感到抱歉，他的立場轉折反映了個人生命階段不同心境的「真實」。

本文利用自傳與口述性質的材料，研究親歷抗戰者的童年經驗，探討兒童如何面對戰時生活，分析他們的勞動、學習與情感之外，也關注抗戰這件事是如何被兒童理解與接受，並且在日常生活中實踐。傳主們提供的材料不可避免地受到過去經歷與當下立場的左右，並且呈現出一定程度的主觀性。除了注意傳主是如何從現在的立場對過去作出解釋之外，更重要的是貼近傳主們的視角，理解他們如何看待過去的那段歷史。本文強調正是這些被保留下來的珍貴回憶，成為我們研究抗戰那一代人歷史的重要窗口。以金敬邁為例，進入老年後的他，雖然陳述的是童年往事，但已經投射出他個人當下的見解。他在描繪童年經歷時，既保留了大孩子的心思，吐露八年抗戰下中國人仇日的民族怒氣，也對自己當年幼稚的行為與心態進行反思，並且給予抗戰歷史自己的評價。不得不承認，日本戰敗後中國並沒有立刻從谷底爬升，民眾接二連三遭遇數波政治劇變後，發現民族主義至上的價值，並不能解決一切問題。這些戰後的發展與個人經歷，都不可避免地影響了金敬邁對抗戰歷史的認知。

另一方面，傳主們陳述回憶的過程雖然受到當下現實環境的各種制約與引導，但正是藉由主動書寫或口述，他們可以對過往重大歷史事件發出聲音，表達自己的看法，賦予抗戰史新的意義。這其中不僅僅是作為戰爭受害者而要求公道的聲音，還有身為兒童與普通人在戰爭中積極求生存、互助互愛的故事。傳主們探索從更平等的「人」的價值出發，擺脫世俗價值的評判，指出並非只有王侯將相的戰爭經歷才值

得被書寫；有些傳主甚至同情並理解飽受戰爭折磨下的所有人類，包含發動戰爭國家的人民，走出民族主義的框架，以「人」對「人」的高度，將抗戰經驗的價值提升到全人類戰爭歷史的格局。

「人」的歷史，不僅指成年男性，也包含女性，更有以兒童作為人的獨到之處。兒童重要的特質之一便是觀察與模仿。他們藉由觀察與模仿成人言行，熟悉並加入成人世界的運作。這說明他們所在的社會位置屬於主流的「邊緣」，使他們得以在人們習以為常的既定觀點上，提供重新審視歷史事件的視角。例如，關心周遭卑微小人物的命運，為何悄無聲息地被歷史洪流吞沒；或是誠實表露對戰爭充滿好奇及興奮的情緒。因為戰爭，兒童可以不用坐在教室上課，得到外出活動的機會，這可能是他們最初樂於被動員參與抗戰宣傳、演戲募捐，以及慰問傷兵的原因之一。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日常體驗，卻最貼近真實生活。

同時，戰爭為生活帶來各種難題與禍害，強化了兒童的抗日情緒，團結了民族意識。在此過程中，家庭作為兒童生活的單位，他們與家人一同經歷戰爭，經由逃難進入更大的難民群體，或是進到學校，以集體的方式體驗戰爭：他們與群眾一起被日軍追逐而疲於奔命，或搭上塞滿難民的火車，和素不相識的人們幕天席地於荒野，或是冒著生命危險協助游擊隊跑腿，在同仇敵愾的情緒下，共鑄民族齊心抗日的意識。

兒童應對戰爭充滿正面主動的心態。他們對家庭的貢獻可以從物質勞動與精神層面來看。他們操持各種雜務，例如照顧弟妹、打雜工、叫賣生意、搜集食物，甚至是乞討，或

偷取食物來餵飽家人。這說明兒童積極為家庭付出，渴望得到父母肯定，即使這份力量在一般人看來是多麼微不足道。同時，兒童也是成人寄託希望的對象，他們被期待在失去父母的最壞情況下，扛起照顧弟妹的責任，或是在未來承接振興家族的使命，和成人共同承擔戰爭帶來的各種壓力。而男孩尤其在家族延續的課題上，備受父母期待。當傳主們向家族後輩、乃至大眾讀者重述這些過往經歷時，既是對個人戰爭童年經驗給予肯定，也是提醒史家關注小人物的聲音，以及從家族史的角度來認識整個民族抗戰的艱辛過程。

再從兒童戰時的學習活動與場所來看，學校教育在戰前已是國家培養民族幼苗的重要體制。儘管戰亂使得學校難以維持正常運作，導致兒童的學習經常被中斷。仍然有許多兒童在父母的堅持下「游學」，不停更換學校，或轉入「私塾」繼續學習，克服戰亂帶來的諸多不便。不少學校或私塾的教育工作者，懷抱救國熱忱，想方設法將國家觀念與重要的教育知識傳遞給兒童。這些名不見經傳的人物及其事蹟，都在傳主的見證中留下歷史身影。

除了私領域的家庭生活與公領域的學校活動，兒童在成人安排的生活之外，主動發揮創意，與同伴就地取材創造戰爭遊戲。遊戲是促成兒童身心發展最重要的活動。兒童通過遊戲模仿成人的角色與思維，進一步理解戰爭，實踐對民族的認同。同時，遊戲可以轉化現實生活中戰爭帶來的挫折，滿足孩童玩樂的天性，抒解生活壓力。更重要的是，戰爭遊戲折射出現實世界的運作，承載了歷史經驗。孩子們在日常生活中所創造的遊戲文化，以一種兒童獨有的方式將歷史保存下來，同時貢獻於成人與兒童的戰爭文化。

總之，兒童作為行動主體，以他們自己的方式積極參與戰爭，也為戰時家庭與國族做出奉獻。傳主們的童年戰爭生活，並不僅僅是他們個人重要的歷史經驗，也傳承了家族史，擴展成為整個中華民族歷史記憶的一部分。人微言輕的「兒童」視角，不但提供我們重新認識抗戰史對普通人的意義，最終在人類反思戰爭的課題做出貢獻，研究兒童戰爭史的重要性正是在此。

徵引書目

一、口述訪問紀錄、回憶錄、自傳、傳記

王鼎鈞，《昨天的雲》。臺北：爾雅，2005。

王鼎鈞，《怒目少年》。臺北：爾雅，2005。

成湯口述，成英姝編輯整理，《我曾是流亡學生》。臺北：聯合文學，2009。

何兆武口述，文靖執筆，《上學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6。

崔玖口述，林少雯、龔善美執筆，《崔玖跨世紀》。臺北：心靈工坊文化，2000。

張杏娟口述，柯小菁整理，〈女性之眼，時代之影——東北老作家張杏娟口述〉，《文訊》，期 320，2012 年 6 月，頁 89-93。

張鈞主編，《述林 1，戰爭陰雲下的年輕人：1931-1945 中國往事》。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16。

陳彥增，《難童日記》。臺北：INK 印刻文學，2012。

曾向東、徐康英、朱成山主編，《歷史與記憶：117 戶南京大屠殺受害家庭(族)微觀史調查與研究》。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

楊以琳，《夢繞成長路》。桃園：桃園縣文化局，2008。

豐一吟，《爸爸豐子愷》。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2013。

豐一吟口述，周崢嶸撰稿，《豐一吟口述歷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16。

瓊瑤，《我的故事》。臺北：皇冠出版社，1989。

瓊瑤，《我的故事：增訂版》。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19。

二、專書

- 大衛·蘭西(David F. Lancy)著,陳信宏譯,《童年人類學》。臺北:貓頭鷹出版社,2017。
- 中央教育科學研究所編,《中國現代教育大事記》。北京:教育科學出版社,1988。
-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吳叡人譯,《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 何兆武,《可能與現實:對歷史學的若干反思》。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
- 呂芳上主編,《戰爭的歷史與記憶》。臺北:國史館,2015。
- 李文海主編,夏明方、黃興濤副主編,《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底邊社會卷(上)》。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5。
- 揚·阿斯曼(Jan Assmann)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 威廉·A.科薩羅(William A. Corsaro)著,張藍予譯,《童年社會學(第四版)》。哈爾濱:黑龍江教育出版社,2016。
- 孫歌,《主體彌散的空間:亞洲論述之兩難》。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 徐蘭君,《兒童與戰爭:國族、教育及大眾文化》。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 張純,《抗日戰爭時期戰時兒童保育會研究》。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
- 莫里斯·哈布瓦赫(Maurice Halbwachs)著,畢然、郭金華譯,《論集體記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 菲力浦·阿利埃斯(Philippe Ariès)著，沈堅、朱曉罕譯，《兒童的世紀：舊制度下的兒童和家庭生活》。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
- 溝口雄三著，王瑞根譯，《中國的衝擊》。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 熊秉真，《童年憶往——中國孩子的歷史》。臺北：麥田出版社，2000。
- 戴安娜·拉里(Diana Lary)著，廖彥博譯，《流離歲月：抗戰中的中國人民》。臺北：時報文化，2015。
- 羅存康，《少年兒童與抗日戰爭》。北京：團結出版社，2015。
- Yamashita, Samuel Hideo. *Daily Life in Wartime Japan, 1940-1945*. Lawrence: University of Kansas Press, 2015.

三、論文

-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思與言》，卷 34 期 3，1996 年 9 月，頁 147-184。
- 王晴佳，〈口述證言能否成爲歷史證據——情感史研究對近現代史學的三大挑戰〉，《社會科學戰線》，2020 年期 5，2020 年 5 月，頁 104-117、282。
- 王超然，〈超越國族：由口述史中的個人體驗反思抗戰〉，《東吳歷史學報》，期 36，2016 年 12 月，頁 39-69。
- 呂芳上，〈另一種「偽組織」：抗戰時期婚姻與家庭問題初探〉，《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3，1995 年 8 月，頁 97-121。
- 林佳樺，〈戰時兒童保育會之兒童教養〉，《兩岸發展史研究》，期 1，2006 年 8 月，頁 301-345。
- 柯惠鈴，〈戰時的婚姻與家庭〉，收入呂芳上主編，《中國抗日戰

- 爭史新編》。臺北：國史館，2015，頁 109-141。
- 張瑞德，〈在轟炸的陰影下——抗戰時期重慶民眾對空襲的心理反應〉，收入林麗月主編，《近代國家的應變與圖新》。臺北：唐山出版社，2006，頁 261-278。
- 連玲玲，〈從自我書寫到公眾展演：艾佩琪(Peggy Abkhazi)的戰時日記〉，《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期 86，2014 年 12 月，頁 49-93。
- 游鑑明，〈處處無家處處家：中國知識女性的烽火歲月〉，《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期 23，2014 年 6 月，頁 1-63。
- Abrams, Lynn 著，汪正晟譯，〈兼為材料與研究主題的記憶：口述史的變遷〉，《口述歷史》，期 14，2016 年 10 月，頁 321-323。
- Piel, Halliday. "Outdoor Play in Wartime Japan," in Sabine Frühstück and Anne Walthall, eds., *Child's Play: Multi-Sensory Histories of Children and Childhood in Japan*.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7, pp.160-180.

The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of Childre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Intellectuals' Daily Life Discussions

Chia-hsin Ke*

Abstract

Using children's subjectivity as a lens on the history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his article discusses the war experiences and memories of intellectuals' children in order to highlight children's voices neglected in the mainstream, narrative of war history and the national historical consciousness behind it. First, this article uses autobiographical and oral history to analyze the childhood experiences described by the authors. Second, it focuses on how the authors interpret the significance of war experiences in their life history from a unique children's perspective, and presents the complexity of the historical views of different people.

By analyzing children's family life in the private

* Department of History, Sun Yat-Sen University (Zhuhai Campus)

sphere, school activities in the public sphere, and children's game culture, this article explains the important experience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children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Children usually participate in war through family or school, and national consciousness germinates in the process of moving towards the collective. They actively faced the war, engaged in various labor activities, and shared the pressure of war with adult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interruption to their studies caused by the war, they constantly changed schools or transferred to private schools. In addition to the arrangements made for them by adults, children gave full play to their creativity and used war games to preserve history.

As active subjects, children participated in the war in their own ways. When their personal life history is connected with family history and national history, it not only allows us to re-examine the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to ordinary people, but also contributes to human efforts to reflect on wars.

Keywords: history of children, children's cultur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memory, daily life